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8期 2011年8月10日

目 录

【一手按住“Ctrl”键 + 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重振知识分子的风骨（沙叶新）	2
破解社会稳定难题——共识网访谈杨继绳	5
海鸥之歌（林昭）	13
怀念振儿——母亲的忏悔（沙漠）	16
专访 105 岁的老人周有光	34
再访 106 岁的睿智老人周有光	40
“旧歌”与“红歌”（何蜀）	44
一个漫画家最后的幽默（它山）	48
我的“阿姨”——怀念彭子冈（杨教）	52

编者说明：本刊原意刊载交流文稿，因读者群中有许多是不会或不常上网的老人，应这些读者的要求，特地在正刊之外另办了一个网络文摘增刊，以选介一些网络上流传的好文章。由于正刊来稿多为老人的苦难经历，有读者反映，希望题材多样，避免题材单一引起的阅读疲劳。现决定从第8期起，将网络文摘增刊合并到正刊中以拓宽题材，调剂阅读情绪，增强可读性、趣味性。希望大家本着“抢救记忆，追寻真相，交流信息，积累资料”的宗旨继续赐稿或推荐好文章（注明来源）。 邮箱：bsyy1957@126.com。

重振知识分子的风骨

沙叶新

说点“闲话”：我离开上海将近半年了，至今还在大洋彼岸“崇洋媚外”，还在美国做“卖国贼”，还在纽约当“汉奸”，还在我孩子家过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真是罪该万死，罪恶滔天!!回到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之后，我一定先把自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左脚踏右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在美国我有一罪行需要交待，就是我写了一篇反动文章《重振知识分子的风骨》，严重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公然诋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反动透顶，恶毒至极，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连我自己也忍不住了，我要造自己的反，我要革自己的命了!我要脱胎换骨，斗私批修了。

我要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我能再生一次，我一定肩扛红缨枪，脖系红领巾，头戴红军帽，再征红军路……

我要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我能再生一次，我一定站在红旗下，学习红宝书，放声红歌曲，高歌红梅赞……

我还要向毛主席保证：我要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要让红色短信发个不停；我要始终红光满面，红不棱登；我不怕红颜命薄，我就盼红运早来；我真喜欢红旗飘飘，红潮滚滚，红色恐怖，红色海洋；我希望毛主席红彤彤的红太阳金光万道，照红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照红全中国，照红三大洲：亚非拉外加阿拉伯，照红全世界，照红全宇宙……

另外为了彻底改变我在美国的腐朽生活，从今天起，我要改变我的一切：吃，只吃红薯；喝，只喝红茶；荤，只吃红烧肉；素，只吃西红柿；穿，只穿红妆，不穿西装；喜，只喜红色高棉，不喜白色Moli；爱，只爱薄命的红颜，不爱出墙的红杏；棋，只执红子，不执白子；游，只去革命的红土地，不去色情的红灯区……

沙叶新 6月6日端午节，于纽约

2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就从此趴了下去；知识份子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社会文化群体在中国再也不复存在。

这里所说的知识份子是指那些公共知识份子，特指那些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能自觉肩负社会责任，担当社会道义，成为社会良心的那种不卑不亢、挺胸直立于权力之外并能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个人和群体。公共知识份子不是那些仅有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学者，那些专家和学者他们完全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学术道路，他们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可以“不问苍生问鬼神”，只为往圣继绝学；他们可以只管拉车不问路，著书都谋稻粱黍。这些学者和专家确有很多出类拔萃者，他们在自己的研习领域成绩突出，令人拜服。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不为权力张目；只要他们不帮凶，即便去帮闲，在道德上也就不必苛责他们。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半瓶之醋，甚至沦为乡愿和犬儒，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权力集团、知识份子、公民大众，三者并立，互联互制，形成一个持久紧密的三角形的社会结构。三角形边长相等，如同各自角色平等；三角形内角固定，如同各自力量均衡；这样一个能“内控”也能“外抗”的超稳定的结构和机制，可以反制或化解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打击，使其无法发生作用。

知识份子在三者之间是一个居中并有平衡机制的社会力量，当社会出现动荡时，他能起到稳定作用，不至于社会分裂乃至崩溃。如果知识份子软弱无力，甚至力量消失，那势必造成两种状况，或者专制恶魔独霸天下，或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从而社会秩序失范，造成天下大乱；即便改朝换代，也是汤换药不换，旧貌并未变新颜，历史周期律依然循环。

知识份子作用不能像那灶王爷，不能只是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充当和事佬，上下俱欢颜。如此之犬儒和乡愿，左右逢源，必定会在权力的诱惑或打压之下，堕落成“写作班”的笔杆，如以往的石一歌，或当今的五角党，充当宣传工具，沦为御用鹰犬。

知识份子应是思想的匕首，言论的刀枪，精神的高山，灵魂的模范，当权力为非作歹、倒行逆施时，要敢于揭露，勇于抵抗，唤起民众，共同发难。

在一个相对和谐而又需要变革的社会中，知识份子不但要摇旗呐喊，煽风点火，还应在火势失控、毁及社会时，理性地、智慧地协调公民与公仆、权力与监督、自由与规则、权利和义务，执法和公正、独裁与民主、妥协与互利、双赢与让步、激情与理性、独享与兼顾……等诸多关系，从而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在进行变革之后达到新的社会和谐，推动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此时此刻的知识份子功莫大矣，是国民大众的良师，是权力集团的诤友。

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已经不复是“相对和谐而又需要变革”的年代，当代中国已经失去宝贵的可以进行“和平变革”的历史机遇，已经坠入“很不和谐而又很不变革”的高危时期，并极有可能引起难以意料的非常态的突发性的社会裂变。

之所以坠入高危，当然有很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中知识份子力量的消亡，使得权力集团、国民大众、知识份子稳定的三足鼎立，变为权力集团和国民大众二者的正面对峙。更加危险的是，如今“官”“民”两极相互敌对，绝不信任，一旦矛盾激化，势必星火燎原，不可收拾。小则爆发无数极端性的群体事件，大则引发动摇社会基础的全民动乱。就如官民吵架，没有知识份子从中判别、裁定、调解、讲和，只会越吵越凶，最后“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也出手，于是任何时候都大打出手，两败俱伤。虽然判别、裁定、调解、讲和一事本属司法机构之职责，可是当今中国司法不独立，堕落为权力集团的帮凶，不为民众所认可。而另外本应主持公道的媒体，也无公信可言，从央视到地方各级党报，都不是自由言论的独立媒体，除了南方报业尚能说一些真话、人话外，余者皆为权力集团的喉舌、工具。

当今中国太缺少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份子，如法国的作家左拉、前苏联的科学家萨哈诺夫、美国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缅甸的政治家昂山素姬，这在中国几无所见。

据报道，2009年中国用于“维稳”的基金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维稳”费用除了用于失地之农民、强拆之户主等上访或“闹事”的民众之外，主要还是针对异见的知识份子，由此可知，权力集团对付国民大众和知识份子甚于对付国外敌人，所以所需经费要超过军费。

其实不论国内外，被中国权力集团认定的敌人，都是“被敌人”，都是假想敌。就如被他们认定的朋友一样，如前苏联，如现朝鲜，都非真正朋友。相反，对“被敌人”的倒是真朋友，而中国权力集团对这些真朋友却始终不放心，始终充满敌意。试问，现今世界各国还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对国外的真朋友如此满怀敌意的呢？朗朗最近在白宫不是代表了“我的祖国”激情地表演了“我的祖国”对美国朋友的敌意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但最敌友不分的、最媚敌仇友的，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权力集团，堪为世界第一。

知识份子这一重要的社会力量的消亡，是在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后开始的，是权力集团对知识份子长期残酷镇压的结果。思想改造、洗脑交心、批判俞平伯、声讨《武训传》、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直至文革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新政权发动的涉及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不是仇视知识份子的，如此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纲领地，并长达数十年的之久地迫害知识份子，直至整个地消灭知识份子的独立群体，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也堪为世界第一。

早在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原稿中就已经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列为应予消灭的革命对象，被毛泽东视为“极端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1928年，毛泽东在湘赣边区清洗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则不发，这也说明毛泽东对知识份子一

直存有戒心。1930年毛泽东力主清查“AB团”，李文林等不少知识份子出身的红军将领惨遭杀害。1942年在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大批满怀革命激情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都遭到肃整，王实味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以上这些血腥历史，在李锐、高华等人的著作和王来棣的论文中都有揭示。1949年之后以消灭知识份子为目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1925年以来毛泽东对知识份子敌意的继续和发展，只是更阴险、更凶残、更具规模。

1949年，毛泽东曾赋诗：“一唱雄鸡天下白”，白什么？一是共产党“天下”的“一穷二白”之白，这是毛泽东说过的；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张白纸”之白，这也是毛泽东说过的。可对知识份子来说，这“白”是“白色恐怖”之白！毛泽东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有番讲话，够“白色恐怖”的了，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毛泽东说此番话时，其蛮横之神情，其阴损之内心，溢于言表。尤其是说完之后的大笑，更是让人毛骨悚然。那些和毛泽东辩论过的民主人士，如果他们当时也在场恭听圣谕，毛泽东对白色恐怖如此赤裸裸的表露，怎不让他们惊悸万分？果然，文革中，席卷全国的更大规模的白色恐怖终于到来。

凡是由体制、政权这一方所发动的恐怖活动全世界都称之为白色恐怖，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的白色恐怖，从来就没有什么红色恐怖，可“文革”中偏偏将白色恐怖美其名曰红色恐怖，就如明明是阴谋，偏偏说是阳谋一样。披上红色的外衣，便可以将凶残成为合法；戴上革命的冠冕，就能使屠杀成为正当。于是在“文革”中便公开地、大量地消灭知识份子，或枪毙、或坐牢；有的知识份子或惊恐而自杀，或被迫而自裁……天津作家林希是全国最年轻的胡风分子，他有篇自白，说他从被打成胡风分子一直到“文革”这么多年，几死者数矣：几乎被吓死、被气死、被累死、被冻死、被饿死、被病死、被斗死、被打死、被逼死……均因万幸而得免，虽九死而终获一生，但全国“九死”而不能“一生”的知识份子究竟有多少呢？远远不止“四万六千个儒”吧！“文革”距今已40多年，尚无一份知识份子死亡的准确数字和完整名单，这是“我的祖国”的高等机密，秘而不宣。人在中国是不算人的，生命是得不到尊重的，知识份子的命运也如此。

1958年毛泽东关于“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讲话还只是在党内的讲话，并未向社会公开，可是同年，也是1958年，就有云南大学的党委书记李书成将一份党内文件改头换面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南大学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都反对共产党，因此他公开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见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这说出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咬牙切齿之声。

经营了数十年，知识份子果然消灭了。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什么北大、清华？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那个）绿林大学的。”何谓“绿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也，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又自比土匪强盗，他真的战胜了北大、清华所代表的书生。请拭目以观今日之北大和清华，从师到生，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呢？

知识份子确实彻底地被消灭了！

因此近60年以来，在正常的社会里所应见的权力集团、知识份子、公民大众，三者并立，互联互通，所形成的持久紧密的三角形的社会结构，在当代从未中国出现过。毛泽东为首的权力集团对待知识份子只是利用和改造，绝不允许自由和独立。1957年毛泽东多次以“皮”与“毛比作权力集团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认为知识份子不具独立性，也不应有独立性，必需依附权力集团，为权力集团效忠。

毛泽东把两者的关系蛮横地颠倒了。在一个合法的宪政制的社会里，权力集团才是附“皮”之“毛”，而知识分子和国民大众才是权力集团所依之“皮”。也就是说，你毛泽东才真正是“毛”，广大的国民大众和知识份子才是毛等这一小撮“毛”所依附之“皮”。可是以“毛”为首的权力集团

从来就没有“权为民所赋”的法理理念，从不考虑他们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他们总是以“毛”当令箭，践踏撕碎所依之“皮”。可是“毛”一旦无所以附，势必就成了“一地鸡毛”，一塌糊涂，因此才造成目前高危的乱世局面，才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毛”病。

中国要走出高危险区，中国要能够长治久安，亟待解决的事情很多，我不多言。吾以为彻底扭转毛泽东在知识份子问题上的错误，肃清流毒，根治“毛病”，也是要务之一。如此，才能重新树立知识份子应有的社会地位，在权力集团、国民大众中间发挥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作用，才能使中国社会既能健康前进，又能和谐稳定。

做一个中国的知识份子既不幸，也有幸。不幸的一是伤痕累累，牺牲多多，使得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史，成了一部灾难史、血泪史。不幸的二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从没像现在这样的堕落过、无耻过，有的虽是被迫的，有的绝对是自愿的。有幸的一是，历史毕竟翻过了新的一页，知识份子在血污中逐渐站起，在启蒙大众的同时，又警醒了自己。有幸的二是，年轻的一代的知识份子成长起来了，他们少世故，敢担当，敢说更敢干，他们有很多事情可做，有很多重担可肩，有很多志向可立，有很多责任可为……真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曙光在前，春天不远！

2011、2、3 于纽约■

破解社会问题难题——共识网访谈杨继绳

杨继绳先生就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模式以及怀念毛泽东的思潮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为社会稳定难题提供了破解之策。

嘉 宾：杨继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曾任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办的《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出版有《邓小平时代》、《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初版、2010年修订版）、《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近期出版了《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

访谈人：杨传银

摄影：郑 萌

时 间：2011年07月05日

胡锦涛讲话看到了问题，也提到了改革，但要看落实

【杨传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您关注了吗？您觉得有什么新的变化？

【杨继绳】：粗粗地看了一遍，没有深入学习。他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挑战”，说明他看到了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他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提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当然是好的。但要看落实。

【杨传银】：讲话中提到了“四大危险”，再次强调了“发展是硬道理”，又加了一句“稳定是硬任务”。

【杨继绳】：谁都希望稳定，谁都不希望动荡，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稳定。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的支撑力量。这时，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舆论控制，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那时能否保持稳定关键在于政府对种种社会力量的控制能力、对社会舆论的控制

能力。政府的控制力弱了，社会不稳定的危险就大了。

通过改革，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这样，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失效的环节和场合显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证社会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许各种利益主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相互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理解、协商和妥协。大众传播媒介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保持这个渠道畅通无阻，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面对群体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就致力于“维稳”。国家财政投入的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有些地方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和打击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截访”，私人办的“保安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签订合同，通过暴力强制，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这种作法不仅不能保证稳定，反而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要知道，群众上访，说明他们还相信政府，群众告状，说明他们还相信法律。一旦他们觉得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觉得法律失效，他们就不上访、不告状了。这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

现在的情况是，高压锅里压力正在增加，你是适当放气呢，还是不断地再拧螺丝呢？老的办法还是拧螺丝，新的办法是不断地放气，释放减压。拧螺丝加压可能暂时稳定，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还是要减压。

【杨传银】：从接访到“截访”，这也是政府在对待民间诉求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杨继绳】：这种“截访”是制造不稳定最可恨的因素。“截访”是各省的重要任务，在各省“截访”抓不尽的话，国家有关部门还要抓着送回去。送回去就得统计并上报上访人数。地方政府最怕上访人数多了，因为这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上访人数多了，就要影响政绩。于是新的交易来了：我可以不上报不统计人数，但得拿钱来。拿多少钱？一个名额3万！

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

【杨传银】：中共中央很早就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在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怎样保证社会和谐？

【杨继绳】：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不是说喊两句就行了，不是说报纸上宣传一下就行的，是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种制度体系的目的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行政权力和资本都是一种社会能量。一个社会没有权力不行，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一个垃圾场投入资本以后就会变成高楼大厦，变成花园，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现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是：权力没有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没有被制衡的结果就是官民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官”的社会心理。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结果就是劳资矛盾尖锐，就造成“仇富”的社会心理。我不支持“仇官”、“仇富”，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是有制度背景的。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上面说的两对矛盾、两种社会心理有关。

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是权力和资本

【杨传银】：您觉得当前影响稳定因素主要是这两股力量，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资本。

【杨继绳】：对，权力和资本，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的控制，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扩张欲望十分强烈的行政权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藪，是当前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没有被制衡的权力和没有被驾驭的资本结盟，肯定不会有社会公正。

【杨传银】：您在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里面是重点从中国社会的横向的截面来分析当前社会的分层状态。如果从中共执政 62 年来看，社会阶层变化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杨继绳】：我这本书不仅仅展现了 2008 年这一年社会阶层状况，也展现了 1978 年改革以前的社会阶层的状况。还分析了怎样从改革前的阶层状况演变为 2008 年的阶层状况。分析了工人、农民、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群体改革前后的状况和演化过程。所以我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历史著作，因为讲了一些历史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是一个身份社会，有政治身份，有城乡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身份一经确定以后这个人终身不能改变的，比如地主是一种身份，地主的子女要参军、入党、上学都会遇到困难。地、富、反、坏、右，是政治贱民身份，有这种身份的家庭一代两代人都是翻不了身。改革以后政治身份废除了，城乡身份慢慢地有所改善，有所松动，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城乡身份还有篱笆、还有鸿沟，进城农民不可以跟城市人同样的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城市里社会地位高的工作岗位需要城市的户口，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社会群体待遇差别悬殊，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就影响社会和谐。

《共产党宣言》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理论：消灭私有制。”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这个任务了，中国的私有经济绝迹了。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私有经济回归的过程，是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逆过程。现在中国私有经济相当发达了，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私有企业主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靠权力发财的，一种是靠自己的努力发财的。对靠权力发财的大家是非常反感的，靠自己的科技发明、靠自己的把握机遇，靠自己的拼搏这样的发财大家是佩服的。近几年来，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那些靠自己努力发财的私有企业主，也必须投靠权力，不投靠权力，经营就很困难。权力如果不受制衡，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的运行，左右了市场的发展，甚至参与市场经营，这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正。

【杨传银】：实际上这 60 多年来权力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资本的力量只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涉入的。

【杨继绳】：改革以前资本不起作用，只有权力起作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权力也没有什么可捞的。现在是有了资本以后，权力和资本结盟，共同压榨百姓，社会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公正。改革以前的身份社会也是不公正的。百分之十的人被当作政治贱民，几代人不能翻身，能说是公正吗？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甚至饿死，能说是公正吗？但那时在政治高压下没有人敢说话。社会是处于高压下的稳定。

【杨传银】：那个时代大家普遍处于有一个均贫的状态，也有一个均贫的心态。

【杨继绳】：都穷，我到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几千人，90%都是二级工，每月拿 41.5 元。物价也冻结了，文革十年，物价指数反而下降了，是隐性通货膨胀，不表现在价格上，而表现在物资短缺上。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布票不够，衣服打补丁。我当记者外出采访的时候膝盖还打补丁，我不自卑，别人也没笑话。大家都是一样的。现在差别太大了，不一样了。

【杨传银】：改革以前是怎样划分阶层的？

【杨继绳】：那时的说法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说法是很不科学的。现在社会群体比较多了，我将各种社会群体按权力、财富、声望加权综合的结果分了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我写了八个群体，社科院写了十个群体，他们称之为十大阶层。

【杨传银】：他们是按照职业分的。

【杨继绳】：职业和社会地位有关系，但和阶层毕竟不是一回事。

“最高阶层”被世袭是很危险的

【杨传银】：你的书里讲到阶层流动和阶层固化问题，你认为当前这个问题很严重。

【杨继绳】：阶层流动和阶层固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阶层缺乏流动性就是阶层固化。阶层固化也可以说是社会地位继承。阶层流动是缓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今天社会地位比较低，只要我努力，多少年以后我可以到比较高的阶层，这就是流动。如果阶层固化，不能流动，看不到希望，我怎么努力也不行，就会增加社会张力，社会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社会流动是缓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封闭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比较高的阶层被继承了，世袭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

最近几年社会地位世袭问题比较严重。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集体世袭与“权力场”》，皇帝是一个人世袭，而集体世袭是整个阶层，最高阶层都被世袭了，现在形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上完了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做蚁族，成了“穷二代”。

“官二代”的形成，不仅仅中官家的主观愿望，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这种机制迫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的人，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杨传银】：您在书中提到现在新的两极分化：一个新富，一个新贫，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特别明显了，如何化解这个问题？

【杨继绳】：如果让市场规则无限进行，就可能出现两极分化。所以，资本需要驾驭。防止两极分化，首先要保证公平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准入的平等，只要是市场主体，就应当自由进入市场的各个领域。第二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要落实这两个方面的平等，在项目上，必须有公开的、透明的招、投标；在银行贷款上，必须一视同仁；在土地使用方面必须公开招标。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税赋。政府的税收对各种经济成分、各类市场参与者应当一视同仁，税赋平等。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环境。现在这几个方面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交易，有权力的和没有权力的交易，肯定是强者占弱者的便宜，肯定是不公平的。

【杨传银】：要解决还得在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这一块。

【杨继绳】：制衡权力、驾驭资本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建立这样的制度体系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既得利益群体和对社会震动的忧虑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杨传银】：从毛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之初开始，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喊。也有一些变化，但现在又出现了更多新问题，而且也很严重。您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哪？

【杨继绳】：情况很复杂。一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二是对社会震动的忧虑。既得利益群体为什么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对他们最有利，他们的金钱、地位就是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的。保住了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保持现状。有利益问题，也不全是利益，也有忧虑。有些发展中国家引进了民主制度效果不怎么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搞不好的话，就可能引起难以承受的社会震动，甚至造成民族和国土分裂。利益和忧虑并存，就形不成改革的共识，有的是反对普世价值，有的是支持普世价值，有的想搞新民主主义，有的想搞民主社会主义，也有的想恢复毛时代。现代儒学、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等都在发出声音，都说自己的药方最灵，都想按自己的意见改造中国。

【杨传银】：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试点先展开这样的改革呢？

【杨继绳】：政治体制改革是全局的，一个地方试点很难。局部地区要受全局制度和政策的控制。经济改革也有局部受全局控制的情况，那是通过给局部地区以特殊政策的办法搞试点。特殊政策在试点起得了明显经济效益，就可能抵住反对的声音，就可以推广试点的经验。政治问题很敏感，给试点地区特殊政策很难，即使给了，也很难得到经济改革试点那样明显的效果。也有人提出把福建和台湾搞在一起，建立民主制度的试验特区。我看这个设想很难实现。

言论自由和党内民主可以大胆地走

【杨传银】：以您多年的研究和观察来看，这个改革的突破口有可能在哪些方面？

【杨继绳】：首先是放开媒体言论，言论放开以后对腐败是一个制约。腐败东西都怕阳光。宪法第35条就给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只要按宪法做就是了。第二个是党内民主可以大胆地走，可以大步地走，党内民主有很大的空间。党政分开，是邓小平说的，不存在没有共识的问题。现在党代会的代表基本党委是指定的。所谓党代会都是官员和依顺官员者的大会。不仅党代表应由党员选举产生，从党支部书记直到中央书记也可以选举产生。党内也可以搞权力三分、相互制衡。党内要有批评党的政策的自由、批评官员的自由，应当可以发表反对意见。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历来是有派别的，但不合法，不能搞“非组织活动”。即然党内派别是客观存在的，何不公开化、合法化？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并且在党章和国法中建立不同派别竞争的规则，就可以摆脱政治垄断，实现权力制衡。当然，党内民主要和全社会民主良性互动，如果只搞党内民主，不让党外人士参与，那就可能重复晚清“皇族内阁”的笑话。

【杨传银】：党内民主要和全社会民主良性互动，很好。全社会民主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探索“新路子”，比如说在人大代表制度上下功夫，最近很多地方出现“独立参选人”。

【杨继绳】：有人害怕“独立参选人”，采取种种藉口阻止。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近期讲到姚立法的参选问题时说，他在湖北省当书记时支持姚立法，后来姚立法到美国去考察民主制度，性质就变了。（参见《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南方周末》，2011-06-23）到美国去考察怎么性质就变了？很多官员不是到美国去实习，考察吗？官员到美国考察性质没有变，怎么老百姓到美国去考察性质就变了呢？俞正声种说法令人费解。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出版一波三折

【杨传银】：《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是99年出的第一版？出版过程顺利吗？

【杨继绳】：99年写完的，当时国内无法出版，2000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后来国内三联书店几次要出国内版，但是两次都没有出成。2006年广东花城出版社出了，印了八千本，到新疆参加书展，贴了一个很大的广告，中宣部的张晓影局长看到了，她连书都没看，就说这个书不能卖。为此我到中宣部找了刘云山，刘云山不在办公室，我把申诉信留在他的桌子上，再找了张晓影，她说没有查封我的书，我就让她打电话，她不打。张晓影说没有封，广东那边也只好说，中宣部没有封，是我们自己封的。中宣部封的书不让说是中宣部让封的，是出版社“自律”。那八千本书到现在还压在广东

的仓库呢。

【杨传银】：中宣部封书也不下文件。

【杨继绳】：不下文件，电话也不让记，但必须执行。执行中不能说是中宣部的意见，是自己封的。0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次，绿皮书，印了18000本。我告诉他们先别在北京卖，在外地卖，最后进北京，结果快卖完了，进北京后发现了，把胶片销毁了，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还被处分了。大家都知道07年9月份八本被禁书的事，其实是九本书，即我这本书，没点我这本书名，只点出版社。现在出这本书的修订版也不容易。

【杨传银】：这次出版有没有遇到阻力？

【杨继绳】：到目前还没有。

【杨传银】：从第一版到这次出版经过了有11年。

【杨继绳】：第一次在香港出版，包括一次盗版一共五次，每次出版都有更新。

【杨传银】：您感觉这十多年，社会阶层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杨继绳】：阶层固化的问题比十年前严重了，贫富差距扩大了，阶层冲突多了、阶层矛盾激烈了，这些变化在我的书里都有反映，也提出了解决的意见。

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有八方面的进步

【杨传银】：杜导正先生去年六月份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谈温家宝几次公开讲话的文章《扭秧歌也是在前进》，他说，“‘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还是前进了。”您对此怎么看？

【杨继绳】：我在《我看“中国模式”》中讲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上有很大成就，虽然没有搞政治改革，但政治上也有八个方面的进步：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废除了身份社会，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第四，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数”到集体负责制；第五，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第六，抛弃了、搁置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现实利益；第七，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第八，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的形势估量，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方面的进步，有这八个进步，比过去自由多了。改革以前，中国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南方山区农民的终生活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现在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扩大了，国内可以到处打工，也可以到国外打工。知识分子也比较自由，可以到全国去讲课，到世界各地去讲课，这是进步。

但是，中国的现状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民众对国事的参与程度很低；民意表达渠道很不通畅；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司法不能独立；新闻没有自由。中国目前还是威权政治体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权力市场经济。

胡温政府在民生上下了大工夫，但民生不能代替民主

【杨传银】：对比胡温政府与前面的几届政府来看，您对胡温这届政府有什么评价？

【杨继绳】：胡温这届政府最大的动作就是民生问题下了很大工夫，免除农业税，提高了义务教育的经费，低保费用的标准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提高了，现在是3500元，他们上届是1200元，这些措施对底层都是有好处的。

民生很重要，但是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生不能靠政府的恩赐，这几年改善民生是靠政府给的。民生根本问题是给老百姓以权利，让老百姓拥有创造财富、持有财富、享受财富的权利。过去没有这个权利，毛泽东时代连农民挖块地种点菜、种点粮食，可以吃饱点，也不允许。1965年我在延庆大柏

老公社搞“四清”时，工作队整一个姓吴的老木匠，整他的原因是他外出做木匠活挣钱。打工挣点钱也不行的，没有创造财富的权利，更不能持有财富，持有财富的是资本家和地主，是阶级敌人，不能创造财富、持有财富，更不要说享受财富了，那时只是享受贫困：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家徒四壁。

民生的问题根本还是民主。现在胡温对民生问题很注意，但是民生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即民主的问题不有解决。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要让民生代替民主》，在网上流传很广。

海外为什么关注“中国模式”

【杨传银】：现在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非常多，朱厚泽老在去世前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杨继绳】：对，他去世前多次跟我谈及这个话题，但是他手上当时没有资料，希望我作点研究。我写这篇《我看“中国模式”》也算是完成他的一个遗愿吧。

【杨传银】：这篇文章把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观点梳理的比较清楚了。

【杨继绳】：我是尽量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日本的一个经济学杂志也把它翻译过去发表了。一家法国杂志也在翻译。

【杨传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国内外都在讨论的氛围呢？

【杨继绳】：国际上，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平均每年 9.8% 的 GDP 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也提高很多；第二个就是因为两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这次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一些西方国家也加强了政府调控，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国模式”的，其实这是凯恩斯的政策，就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府投资，美国多少亿，咱们中国四万亿。

跨世纪那两年我写过几篇文章批评朱镕基的积极财政政策，题目是《凯恩斯水土不服》，《凯恩斯依赖症》。朱镕基可能不满意，在他召集的一次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朱问：“杨继绳是谁？”吴敬琏作了介绍，说了两句好话，朱就没说什么了。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跟朱镕基年龄差不多，去看朱镕基。回来后说，朱镕基桌子上正放着杨继绳的文章，《凯恩斯依赖症》，上面批批点点，画得乱七八糟。我通过一位朋友问这位老师，他骂了没有，他说，没有骂。（笑）看来朱老板比较宽容。

面对经济危机，凯恩斯政策是需要的，但只能一个短期政策，不能变成长期的。时间长了，副作用很大。这次调控跟朱镕基那次是一样的，也是凯恩斯模式，社会需求不足，政府投资假创造需求，这是一种应急措施，不可能是长期政策。有人认为政府干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焕发青春了。西方学者不太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学者这么说的话，起码是没有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

左右两派的共识与分歧

【杨传银】：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左右派都在自说自话，似乎很难达成共识了。您觉得，目前知识界在哪些问题是有关共识的？分歧主要是在哪里？

【杨继绳】：左派、右派都认为改革出现了偏差，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这一点是共识，需要改变现状也是共识。

但是对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搞市场经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有的说是只搞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造成的。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一种措施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一种措施是进行政治改革，使权力得到制衡，建立民主政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同样的是不满现实，有的想回到过去，有的向往未来。我记得鲁迅说过这句话。

【杨传银】：现在对未来的去向的选择，似乎都很迷茫，当然也有特立独行的，尤其重庆，“唱红打黑”……

【杨继绳】：黑社会当然应该打，但是怎么确定“黑”，怎么打法，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不按照法律程序那就变成“黑打”了，没有法律的阳光的照耀“打黑”，不就是“黑打”吗。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杨传银】：那您怎么看待当前愈演愈烈的“唱红”。

【杨继绳】：“唱红”对老年人来说，没有什么政治的含义，老年人唱不了现在的新歌，他们唱二十多岁时的歌，唱着有青春焕发的感觉，那种旋律和节奏唱着很舒服，他们并没有政治意图。但是作为政治来推广的人就有政治意图了，唱者和推动者不一样。像我们家附近的红莲小区每天晚上都唱，组织者都非常积极，戴着红标。有天我看到了这位组织者，一个老头，我以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他说，我们家是资本家，倒霉倒了几十年。我说，那你唱红歌还那么起劲？他说，唱着好玩呗。已经娱乐化了，唱唱歌，精神焕发，身体也好。

【杨传银】：网上有传言说重庆这两年“唱红”已经超过 10 万场次了。

【杨继绳】：那不过是他进十八大常委的敲门砖而已。他了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他老爸坐牢，他自己也坐过牢，他肯定不会回去，他就是一个敲门砖，实际上他迎合了当前一种思潮，什么思潮，怀念毛泽东思潮。

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呢？我在 1998 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是这么写的：“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和本来面目根本不一样，带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现在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占，工人下岗，出租车司机每个月交五千多块钱的租金，感冒一天也要掏 250 块钱，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他们对现实不满，说是怀念毛泽东时代，实际是怀念那个“抽象的社会公正的符号”。

他不知道毛泽东时代有另外一种问题，比如我讲的身份社会是另外一种不公正，挨饿、吃不饱，饿死几千万人，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也不相信。有怀念着毛泽东时代的思潮，就有人的一迎合这个思潮，拿到“选票”，当然实际上没有选票，无形的力量这也会抬升他的地位。真正到位以后，他得面对社会现实，采取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这个敲门砖也就扔掉了，他本来是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

12

历史给下一届的任务已经摆在公众面前

【杨传银】：那您对“十八大”有什么期待呢？

【杨继绳】：“十八大”前的现在，有两个热门，一个热门是人选，十八大班子的谁上谁下的问题。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另外就是十八大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执政理念、执政方针，关键是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人事问题的保密历来是做得比较好的。知道情况的人不敢说，不知道的人大胆地瞎说。人事问题没有必要猜测。执政理念和执政方针需要关注。现在各种思想、各种理论都会浮出水面，都在极力地表现自己，都想用自己的理论来改变中国。

十八大以后，不管谁上去都要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都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再拖十年根本就不行了。历史给下一届的任务已经明显地摆在公众面前。这是不用猜测的。不管谁上去，只是行事风格不同，方式不同而已。

【杨传银】：目前各地的发展模式，比如外界广泛讨论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您觉得哪些地方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推广？

【杨继绳】：我没有对这方面进行实质研究。就是重庆“唱红打黑”，我没有注意其他地方搞什么特殊的東西。汪洋前几年在广东搞过一个“解放思想”，后来也没有结果，又开始坚持“科学发展观”，搞一圈又回来了。■

海鸥之歌

林 昭

【作者简介】 林昭，女，苏州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1957年主持正义，为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辩护、鸣不平，因而也被打成右派。1960年在上海母亲家中养病时与兰州大学“右派”难友一起办了地下刊物《星火》，被打成“反革命集团”，1962年被判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处决。并派人到其母亲家中索取子弹费。1980年平反。由于她一直坚持信仰，追求人权、自由、平等，坚贞不屈以致献出生命，人们誉为中华圣女。

灰蓝色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驶行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链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因为他怕自由像怕火一样；
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一个苍白的青年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只有眼睛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育，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这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像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像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像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像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像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像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的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像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继承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
价？
为什么你竟像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像，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到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那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起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链一齐断裂，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哪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和河流，
深深地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的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铐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波浪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一一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最贵重的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像飞燕般踪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像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他，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像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像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轻人沉默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怀念振儿——母亲的忏悔

沙漠

按：沙漠，本名张坤权，女，40年代在陪都重庆即有影响的著名话剧演员，50年代中期与丈夫黄中敬一起作为业务骨干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支援青岛市话剧团。1957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摘帽”后在文革中再遭批斗折磨。八十岁前后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在已经写了若干回忆亲友的文章并深受好评后，她最后才下决心写出这篇痛悼爱子的文章，因受字数限制，此文曾作若干删节后发表于《炎黄春秋》，后以原稿收入其文集《我心深处》（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振儿是我的爱子，姓黄名小振，生于1947年，江西吉安人氏，出生于重庆，学历小学毕业（工作后才考得教育学院大专毕业文凭）。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常委……

他人生短暂，只活了49年，一生坎坷，能在苦难中挺立，奋发图强，成为优秀剧作家，是个奇迹。

（右图：黄小振遗像）

振儿在降生前有一段奇特的经历：他在娘胎已6个多月，我竟然应重庆《新中国剧社》之邀，主演《茶花女》。6个月身孕的孕妇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不可思议！

能演茶花女是女演员的梦想。我犹豫，一是怕难以胜任，二是怕胎儿的安全。在众人的鼓励下，我冒险演《茶花女》。

如何解决有孕之身是个难题，只凭借助服装帮忙掩盖已不可能，还必须在自己身上下狠心，捆绑腰腹，紧紧束缚胎儿。

在重庆抗建堂演出首场，正值盛夏，酷暑难当，只几个风扇降温。前后台的人们个个挥汗不止。

我化好妆，捆绑定当，披挂上阵。我已知道，宦世安、左昂两位中西名医在剧场前排看戏，为我保驾，防我中暑，若有不测，便于第一时间抢救。

谢天谢地，没有出现险情。戏结尾时，茶花女死在阿芒怀中，我也一似断了气，动弹不得。在热烈的掌声中谢了幕，同仁们全围了过来，问着同一句话：你没事吧？没有人问束缚着的胎儿没事吧？只有娃儿的爸爸，中敬说：“担心啊！既担心你，又担心肚里的娃，动了胎气，可了不得。”而我想的是“没有辜负观众”、“没有辜负茶花女！”没有想到被束缚的胎儿。他真乖，不踢不乱动，没有任何反抗挣扎，丝毫没有干扰我，这个有功之臣，竟然被忽略，孩子，对不起啊！

此前，他在娘肚里只4个月时便挨过娘打。那是我演《上海屋檐下》，人在台上，睡在我演的“施小宝”床上候场……该我接戏时，没有任何动静，冷场！台上停顿了，妊娠反应使我困倦不已，我……我竟在台上睡着了！……我误了场。险些酿成演员误场闭大幕的罕见事故。我是个很敬业的演员，怎容得自己误场！事后我痛哭，拼命垂打肚子，埋怨道：“都是这孩子闹的，我太困倦了，是他让我误场的。”

在娘胎里他已为话剧受了屈！

在娘胎里他已为话剧作了“贡献”！

振儿不仅孕育在浓郁的艺术天地中。照顾他的保姆蒲嫂是个十足的戏迷，她除了把振儿按时送到后台让我喂奶，便抱着襁褓中的振儿在剧场看戏，她喜欢看我的戏，百看不厌，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年妇女，竟会背阿盖公主（《孔雀胆》）、罗湘绮（《秋海棠》）的台词。无论怎样告诫：剧场空气不好不



宜抱孩子看戏，她阳奉阴违，连连点头，转身又进了剧场，不误看戏（经常是日夜两场）。她总能把振儿哄得乖乖的不哭不闹，在襁褓中受着话剧艺术的熏陶。

这个在娘胎里挨打、受束缚的振儿，后来竟出落得健健康康且聪慧过人，更为难得的是他后来真的为话剧事业出了力，取得成就。

幼小的振儿，不似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那么漂亮、伶俐，会发嗲，亲友个个喜爱、夸赞姐姐，不经意地冷落了他，父母的爱也倾斜于姐姐，他不争宠，不邀宠，有股凛然的小男子汉的英气。

他有独特的个性。记得，两岁那年，建国前夕，我在文工团工作，少有时间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一天，我来到幼儿园，女儿小明很快便雀跃着妈妈妈妈地叫着倚在我身旁吃着妈妈带去的糖果。小振独自在院中央在摆弄手里的东西，园长喊道：小振，妈妈来了，快过来！他听见了，抬头看看，表示知道了，仍低头专注摆弄手上的东西，他正在捏一块橡皮泥。我喊着小振，正待跑过去，园长拦住了我，说：“别打扰他，他做完了就会跑过来，这孩子做什么都力求做得最好。”赞许地看着在秋阳中晒得满头冒汗的孩子，又说：“打扰了他，让他没做好，他会很不高兴的。这孩子很优秀，个性很强。”我似乎第一次听到夸幼儿“优秀”，一般都夸乖、聪明……这“优秀”留给我很深印象。这是位有着丰富幼儿教育经验的园长，这里的多位教师，有着高学历，来自燕京大学、北师大等名牌大学，从事幼儿教育、营养学……连保育人员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我非常信任这个北京一流的幼儿园，把孩子放在这里特别放心，振儿从小受着优良的幼儿教育。

终于完成了“杰作”的振儿，两只小手捧着一小块方方正正的橡皮泥，蹒跚着跑了过来，一路喊着“妈妈，你看方不方，正不正？阿姨，你看看，好不好？”我一把抱起了他，和园长同赞：又方又正！太棒了！小振似英雄般看着姐姐，他得意，妈妈抱我、妈妈夸我！

小朋友开饭时间到了，我把带来的糖果交给园长，依依不舍地说：“我这星期日又不能来接孩子，迎接开国大典，文工团特别忙，扭秧歌、打腰鼓、练方阵，不能请假……”园长说：“我们理解，不是你一个，放心，我们会安排好的。”女儿小明哇地哭了：“不，不，我要妈妈，妈妈接我们……”两岁多的小振说：“姐姐别哭，妈妈不忙了就会来接我们的，妈妈，是吧？”那小样特别可爱，懂事，难怪园长夸他优秀。

几个月后，振儿病了，感冒发烧引起腹泻，我由于忙，幼儿园送他住进儿童医院，两天后我才请假赶去看望。进了医院，急急穿上白大褂，由护士带领着进了病房，一眼见到了振儿，忙不迭轻声喊着小振，儿子，妈妈来看你来了。孩子见了我，坐了起来，喜形于色，眼发亮，张嘴正要喊妈妈。刹那，表情起了变化，嘴闭紧了，头转向一旁，时而用眼瞄我一眼，随即又把眼神滑向别处，反复几次，潜台词表达得清清楚楚：你不来看望我，我还不理你呢。我近乎央告：“对不起，儿子，妈妈忙，请不了假，没来看你……”他偷偷看了我一眼，依然又转向别处，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但却不肯正眼看我，不肯叫一声妈妈。同病房的三位年轻母亲几乎说着同样的话：“孩子叫一声妈妈呀，妈妈是爱你的。”振儿不为所动。她们纷纷说：“孩子太想念你，他不吵不闹，时不时低声喊妈妈，妈妈，有时可能难受，会大声喊妈妈……”我满含热泪说：“他是真生我气了，他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陪护，他能不生气，不伤心吗？”护士在一旁说：“他很乖，很听话，幼儿园阿姨常来看他，他问‘我妈妈呢？我想妈妈’。孩子可怜啊！好在他马上可以出院了……”

任凭我怎么哄他，他始终不理不睬。时间紧迫，我不能再逗留了，强吻了他一下，说了声再见，硬着心肠，往外走，边走边回头，总以为他会回心转意，会叫一声妈妈，谁知孩子铁了心，纹丝不动，他才两岁多呀！我呜咽着拜托那几位母亲多多照顾，谢了又谢。走出病室，我便飞快地跑，怕要迟到了，猛地听到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是儿子稚嫩的声音，没错！我心颤了一下，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我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革命第一！纪律第一！

我知道这会怎样的伤害儿子幼小的心灵，他或许会想，妈妈的心真狠！他不可能留在记忆里，他还太小。但那眼神，那哭声，一直刻在我心上。

这孩子的个性非同寻常、这个性影响了他一生。他是硬汉子、认死理、能咬牙。

振儿6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我记得清楚：那年他刚上小学，一天放学后，五六个孩子在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宿舍不大的场地捉迷藏，大呼小叫，惊动了正在家里埋头读剧本的一位演员，他大叫一声：“别影响我工作，一边玩去！”孩子们没理会，围着他窗前的大树打闹。这演员叔叔气不打一处来，开门，揪住一孩子，说：“就你闹得凶！”顺手一巴掌打在头上，失手过重，孩子一个趔趄，撞到了树上，大哭着跑开了，其他孩子也吓跑了。正在另一处下棋的小振，见状，挺身而出，说：“别哭，没出息，郭叔叔打人不对，找他讲理去。”拉着比他大的那孩子走在前，另几个大孩子跟随着。敲开了郭叔叔的门，不待他问，小振说：“郭叔叔，您为什么打人？他们吵了您，您可以批评教育，告诉家长，怎么动手打呢？老师说有了错，要认错要道歉要说对不起，您错了，应该道歉！”那位叔叔说：“行了行了别闹了，我不是故意，走吧，我忙着呢。”小振不依不饶说：“叔叔，您要认错要道歉要说对不起。”叔叔见小振那认真模样，不禁失笑，道：“行，行！我错了我道歉，对不起小朋友！”“谢谢叔叔。”小振领着小朋友行了少先队礼，雀跃着玩去了。那时我正在院中一角洗衣，见到了全过程，笑对老郭说：“别介意。”他远远地竖起大拇指说：“你儿子打抱不平，教育我认错道歉，他也不忘领着孩子们给我行礼道谢，一板一眼，很有章法，很有礼貌。这孩子好样的，优秀！”我记得这声“优秀”，这位叔叔从不轻易夸人。

1956年我们夫妇带着一双儿女由北京调到青岛，组建青岛话剧团，我俩都是剧团的主创力量，工作繁忙，上午排戏，下午学习，晚上演出，休假日是不能保证的。

我担纲主演《桃花扇》，中敬主演《长虹号起义》又导演《双婚记》，他还是核心组成员，更是忙碌。

两个孩子被安排在离家不远的黄台路小学。这两个由北京转来的新同学，引起同学们极大兴趣。受到的关照、帮助多多，姐弟俩很快融入这全新的集体中，毫无陌生感。特别使姐弟感到新鲜的是这里有大海！这个海滨城市真好。

姐姐黄小明能歌善舞会表演。弟弟黄小振也多才多艺，喜欢音乐、美术，更喜欢作文。姐姐美丽、活泼，弟弟拘谨、内向，两人都属于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受到格外关注，还因为他们的父母是话剧演员、导演。

由于剧团工作的起居时间不同于其它工作——孩子们上学时我们还没起床，待我们演出归来时孩子早已入梦乡。我们和孩子相处时间少，交流少，很少有机会辅导孩子，他们似也毋须辅导，那时小学生没有大量的作业，学习是轻松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检查孩子留在书桌上的作业本，他俩的作业完成得都很好，仔仔细细整整齐齐，难得有误差，我和中敬分别在姐弟的作业本上签字（我签低年级小振的，中敬签高年级小明的），留待第二天交老师，我们便完成家长的任务了。此外便是看他们留的小字条（短信）汇报……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写几句，振儿有时汇报：今天，同学来做功课，我请他们吃了饼干（或是糖果）。他从小诚实，做事认真，我们有什么叮嘱也留张条，他们的生活由保姆照料。

我们少有时间陪孩子去海边游泳、在沙滩晒太阳，游戏。若有这样的时刻，一双儿女便像过节，开心得很。一次全家去游泳，在海边，振儿远远看到两个同学，高兴地大声招呼他们过来，忙不迭地说：“这是我爸爸妈妈。”又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同学，他外号娃娃，他叫面条。”我笑出了声。只见娃娃、面条这两个孩子一脸惊喜，瞪着眼，一动不动，忽然，扭头便跑，随即又转身一鞠躬：“阿姨叔叔好！”飞奔着朝不远处的人群跑去高声喊着什么，我奇怪，这俩孩子怎么啦，冒冒失失的。小振说：“妈妈，他们是高兴，同学们特别想看到您们，您看您看，您看……”远远望去，那边的人群正看着我们在议论什么，频频向我们招手，原来他们是对演员感兴趣，是对演员的尊重。我和中敬连忙笑着招手回礼。

小明嚷着要爸爸快下海游泳，手拉着爸爸下海去了，回头喊弟弟快来。小振应了一声，仍兴奋地拉着我手，说同学们如何如何问长问短，问你们对人和气不和气？架子大不大？爱不爱吃蛤蜊（青岛

人人爱吃，价廉物美的特产）……这个内向的儿子，今天出乎寻常的激动，平素他不善于表达，也极少在父母面前表现得那么亲昵。如今他笑得那么灿烂，小脸红红的，他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那年代文艺工作者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演员、导演是了不起的人物，哪个孩子不羡慕有这样的家长？振儿的自豪感如此强烈，是我过去不了解的。我爱怜地抚摸着振儿的头问：“你将来也做个文艺工作者，也干这一行，干话剧，好不好？”振儿回答：“好，一定。”

那时他 10 岁。

小振的班主任打算把由小振带领的学习小组设在我们家，每天放学后到我们家做作业，征求家长意见，我们同意。振儿很高兴，把这看成是对自己和同学们的信任，他很在意，这是对他的尊重（一般学习小组设在有家长在家的家庭）。

他一直生活在文艺圈子里，受着家庭影响，从小酷爱文学艺术，父亲是他的偶像，爸爸有才有学问，他希望将来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这个时期，振儿是非常快乐、幸福的。

我们五口之家（婆母也接来了）生活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享受着良好空气、蓝天白云，城市整洁，鱼虾螃蟹那么新鲜，便宜得惊人。更何况我们的工作、事业那么顺心，人际关系也挺好。家庭生活和睦、亲密，充满了爱。这段美好时光使我们陶醉。

风云突变，黑色的“1957”打破了宁静美好的生活！和风细雨的“整风”怎么突然变成狂风暴雨的“反右”？

在劫难逃！我们夫妻双双落马。

此前我们已经历了多次运动，虽未当上“运动员”，但胆战心惊的恐惧早已领略。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党反复动员的。

骤然，乌云翻滚，各种各样的小组会频频召开，积极分子表现异常，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窒息……

大鸣大放大字报……来势汹涌，担心娘（婆母）受惊吓，决定送娘回北京小姑子家，却完全没考虑把两个孩子也带走。判断失误，以为自己一心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会出问题的。即使受冲击也不会有多长久，“治病救人”，整一整，吃点苦头，便会放生。

天旋地转！大字报铺天盖地，丈夫黄中敬成了主角，我算得女中豪杰，一花独秀。批判，步步高，不容分辩，很快定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敌我矛盾！

我的罪状是“反对民主集中制”：我说，“青岛选人民代表，选民对候选人一无了解，只划圈圈，干部尚如此，老百姓呢，这是形式民主。”我哪知这是大罪呀！中敬的问题肯定比我严重。

天塌了。

家里出了大事，父母出了问题，孩子们已感觉得到。住所和单位紧相连，孩子们进进出出，随处可以见到大字报，纵使不敢近前看，但大字报上爸爸妈妈的名字和“右派分子”这些字样早已映入眼帘，什么是“右派分子”，虽不明白，但肯定是坏人，是反动派！周围群众对我们一家的态度大变，爸妈紧锁眉头。孩子是懂事的，从不问。

瞒是瞒不了的，如何面对孩子，如何向孩子作交待？口口声声教导孩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能告诉孩子，说这不是真的？不行！（党说你“是”，你能说“不是”？）说“是”？也不行！张不开嘴承认说“是”。

孩子们照常去上学，一向以父母为荣的振儿，不知如何面对同学和老师。所幸同学们依然对他很好，别人尚不知道。内向的振儿，本来说话不多，更加沉默寡言（那时，姐姐已上中学不在一起了）。

这期间的一天，我遇到振儿的班主任，她问：“黄小振最近情绪不好，很少说话，不合群，学业下滑。问他，什么也不说，家里没事吧？”当时我还在主演《桃花扇》（来不及换演员），外人不会知道我出事。我不敢正视她，只说以后谈吧，匆匆走了。这么好的机会，请老师协助，开导小振，我轻

轻放过了。

老师传达的信息，理应引起我高度重视，被我疏忽，不，不是疏忽，是回避，事情还没完全明朗以前，只想瞒一天算一天。

不敢面对儿女，唯有回避、躲避。我宽慰自己，我的孩子都懂事，不会给我们添麻烦，振儿是条硬汉子，他能咬牙，能扛，从小如此，他是可以放心的。

孩子们心里有着多少苦和痛！为什么大家说爸爸妈妈是右派分子？他们不是！决不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是！多么希望抱着爸爸妈妈哭问，到底怎么啦？告诉我们，但没有回应。爸爸妈妈顾不得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没有给受到了伤害的幼小的心灵关怀、爱，他们需要温暖、抚慰！我却回避。

正式被划为右派分子，签字画押后，中敬划为极右，去全市右派集中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我是“五类”（等级）在本单位监督改造。随剧团长年在外地巡回演出——打扫卫生、刷厕所、洗服装、做道具、搬布景、干粗活、演群众。我已不是演员，已远离舞台。

失悔没有及早送走孩子！待到我们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怎敢连累亲友接纳一双右派的子女？谁不怕株连？

两个孩子生活在无人照料、受歧视中，一个13岁，一个11岁。五口幸福之家，几近破裂……

我随话剧团巡回演出，走了，撇下了孩子。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一年。强迫自己相信儿女是可以放心的（我怎能相信呢？）……我告诉自己此刻需要的只是努力改造，改造好了，得以早日摘帽归队——回到人民队伍，才能和儿女相聚，才会有正常的家。我改造非常卖力，劳动强度大，剧团的劳动，咬咬牙我能忍受，但人下人的受歧视的日子是不堪的，精神上的凌辱是难熬的。唯有想起儿女，心头才会有一缕暖意，些许温馨。

面临灾荒年月！忍饥挨饿大人尚能忍受，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怎么得了？剧团外出，一般有留守人员，他们有责任照顾家长随团外出的孩子，但对右派的孩子能一视同仁？谁正眼看一眼？遑论照顾！唯有等中敬半个月一次回家休假时想方设法给他们做一顿饱饭吃，懂事的孩子看到爸爸舍不得吃，哭着说：爸爸，您不吃，我们吃不下，您那么瘦（三个月的强劳动，竟使中敬这个180斤的壮汉子瘦了60斤）。中敬告慰我：“孩子可以放心，特别是振儿，懂得严格控制用粮，按定量吃，从不寅吃卯粮。他曾在路上捡到一皮包，跑着追上丢包人，人家打开包，见里面钱和粮票原封不动，很感动，拿出一斤粮票酬谢（那时一两粮也珍贵），小振谢绝跑开了，这事不是他自己讲的，是路上有人见了来说的。振儿在这些方面特别信得过。”

时隔不久，勒令搬家！（怎能给右派分子还住在团里最好的房子？）中敬来信告我，搬到市场三路，剧团另一宿舍，是一破烂小屋，久已废弃的小伙房，原不是住人的，潮湿不堪。无光亮，昼夜需点灯照明。

无须多说就能想象，在大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何搬进这破瓦寒窑？当时，一切都顾不得，担心的是孩子们如何适应！身心受到怎样的伤害！最怕的是苦了孩子。

振儿已从小学毕业，分配到离家较远的中学（姐姐已读初三，和弟弟不在同一学校）。离开原来的学校和亲密友好的同学，原本心情不好的他，更感孤独。刚迈进中学大门，一天，忽然从后面传来：演员……右派……右派的儿子……他没有回头，认准有人知道了自己的底细，在说爸爸妈妈的坏话。这意外，使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受到的打击、伤害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他选择了逃学。

每早，默默背着书包上学去，漫无目的地走，走啊走！等到中午时分，远远见到放学的学生，他跟着往回走，到了家，只他自己。姐姐在学校吃饭，不回来，他胡乱吃点什么又背起书包上学去，又不知去哪儿游荡……学校也没来家走访，老师根本不认识他，也可能家庭情况特殊，老师放弃不管，任凭这个12岁的初一学生旷课逃学。至今我不知道那漫长的日子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是个有尊严的孩子，他不会和街上的流浪儿鬼混。小小年纪的孩子如何承受这样的孤单和苦痛？

从此振儿走上坎坷路，他的世界变了，他的命运起了大的变化，没有温暖、没有爱，他已成为流

浪儿。等待他的是苦难，那不是一般的苦和难。

振儿成了流浪儿……我们竟全不知！

中敬无法保证半个月一次的休假，他几乎和我一样对振儿的变化一无所知。

我随剧团改造，远在南方，忽被告知：黄小振拧了公共厕所的灯泡，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拿了邻居晒的两件旧的棉毛衫裤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逃学，夜不归宿，家被盗……晴天霹雳！断难置信！

小明早些时候已被送到远离市区的亲戚家（担心女孩子安全）。我们的新家没有安全感，它在宿舍的大门洞口，特别可怕的是，它的前面是“自由市场”，那是特殊的年代——饥荒！每到天色昏暗，黑影乱窜，这里便成了“黑市”，除了小商小贩外，有许多只在黑暗中活动的人群，口里小声喃喃：要粮票不要？三元一斤，要馒头不要？三元一个，“把子肉”，一元五一块……这里物物交换，暗地里而不是公开的活动，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破旧衣物，炊事用具……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在这里换吃食——高价食品，三元一个小馒头。

这里吸引着饥饿的人群，诱惑着饥饿的孩子！

振儿独自生活在这里，无人照管，饥肠辘辘，每日面对黑市的叫卖，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如何抵制、抗拒这强烈的诱惑？

他变了，真的变了！人是会变的。

我随剧团归来，回到这个“新家”，虽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仍被眼前的景象击倒：残破的门虚掩着，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定神，依稀看到门边有一拉线开关，一拉动，亮了，小日光灯悬挂在高处，在昏暗的照明下，室内空荡荡却凌乱异常，一大两小三张床，被褥全不见，床上、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乱糟糟的杂物，书籍纸张随处散落，狼藉一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味，令人作呕。我呆立不动，惊诧、迷茫，这是家？我的家！？良久，跌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哭！家已破，人呢，我的儿子呢？我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忽地，有人在门口轻声问：回来了？我吃惊地站了起来，忙说请进。进来的是一好心人，平素少有往来，她是舞美组的。她急急地说：“别难过，你我同命运，你比我强，我那位，成了右派，说是历史问题，进了监狱。我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长期在家养病。老大出事了，怎么办？前些日子他和街道办事处书记的儿子，都住在你这里，对我说：‘小振一人住，害怕，我们陪他。’我还嘱咐：‘他小，家长都不在，你们好好照顾他。’谁知后来这三个孩子都不见了，这两个大的带坏了他，你儿子小得多，11吧？”我答：“今年12了。”她接着说：“还那么小，不至于出多大问题。别太急，急也没用，我没到处找，也没报案，有什么用？这拨孩子出事的多着呢，咱们团里有多少？别的剧团，都一样，没家长看管，守着个黑市，饿啊！不懂事的小祖宗能不惹事？”说完就走，到了门口，停住，转身说：“我们不要互相来往，有消息彼此告诉一声，我今天来是冒险的。”脸无表情，心是热的，她说话实实在在。我充满了感激，感激她来看我，告诉我急需知道的有关振儿的情况，特别是这位母亲竟然毫不犹豫说，是自己的儿子带坏了小振……没等我说声谢谢，人已走远。

我终于落泪。是啊！他还那么小！他本可以倚在妈怀里，哭喊着：“我饿……”饥饿的儿子啊！你回来吧，妈妈不怪你，纵使有天大错，妈妈承担。

我知道无处可寻找，但我依然寻呀找啊！在夜深人静时，我悄悄外出寻找，火车站、长途车站、轮船码头这些地方，找了个遍，果然那里扎堆的有许多流浪儿，蜷缩在一起熟睡着，有的脸上盖着报纸，身上披着麻袋片，看不清，我便掀开盖在脸上、身上的东西，细细查找辨认，少不了把在梦乡中的他们扰醒，惊恐警觉的眼神、怒目而视的敌意、张嘴便是粗话，待看清是个中年妇女，会嬉笑着嘲弄：“又是找儿子的吧？”“我是不是你儿子？”“给我饱饭吃我给你当儿子，嘻嘻……”吓得我拔腿就抱，唯恐惹众怒、被殴打……这些是哪家的儿郎？或许他们的母亲也在寻找儿子？振儿也会是这样？天！心似被掏空了。

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手足冰冷、浑身颤抖，心乱如麻，夜难成眠。下决心再不找了，受不了这刺

激！但一到夜半三更，思儿心切，我又去继续寻找，躲开人们的视线……

没人过问，谁敢关心？少不了冷眼、白眼。偶尔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马上避开，怕自己会哭出来。

联系不上中敬，电话自然没有，邮件通不了，月子口水库庞大的右派劳改队伍，哪里寻得到中敬？一切由我独自担着。度日如年。

某日，劳累了一天，依然支撑着，漫无目标去寻找，垂头丧气归来，疲惫已极，倒头便睡，忘了关门关灯。夜半，忽听屋里有哭声，惊问，谁？什么人？猛地睁眼，见一蓬头垢面的少年站在床前，吓得翻身坐了起来。“妈，妈，是我，我刚才看见您了，您在找我！我跟在您后面，不敢进来，怕您生气……”呜呜地哭着跪下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回来了，我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从晕眩中醒了过来，气、急、恨（唯独没有爱、怜）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怒喝：“你还会说对不起！还知道认错！还回来！滚！”孩子哭着说：“妈，您打吧，别生气，我错了。”我歇斯底里般狂怒着喊：“滚！滚！我们不要你了！”“妈妈，别不要我！”“滚！”“妈妈，真不要我了？”“滚！滚！”一把揪起，用尽力气朝着那肮脏，泪流满面的小脸上猛掴一巴掌，他哀叫了一声妈妈，哭着跑了，真的滚了，没有回来。这一声哀叫的“妈妈”刻在了我心上。

我疯了，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我好悔！一巴掌把回来认错的儿子打跑了！他还那么小。

这一掌，我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我毕生极少动手打人，包括儿孙。

心里有着太多的苦、怨、委屈，我能向谁倾诉？振儿撞上了，原本我在心里反复想过，不怪他，不怪他，他还那么小。

好不容易盼到中敬休假回来，我把发生的大事原委说得很详尽，说，我太不像话，完全失去理智，我疯了，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此绝情，我算什么母亲！我的母爱到哪里去了？我哭得很伤心。中敬劝我不必太自责，把孩子轰走了，他少不了受更多苦，只希望别出大事。这孩子，这年龄，料无大碍，他会回来的。

我们商讨以后怎么办？振儿若回来，我们依然不在家，谁照料他？送他到外地亲友处，谈何容易，两大难题，一是“株连”，二是“果腹”。怎能寻觅既不怕株连，又能果腹的人家？难矣哉！古时，株连九族尚有人冒死营救，如今，时代不同了。

思来想去，中敬想到了马卡连珂的《教育诗》。这苏联名著，我粗略读过，中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挽救青少年失足的唯一途径是交给政府，有党和政府关怀教育才能有光明前途，书里列举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感人至深。一想起《教育诗》，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上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们得出了共识，把孩子交给党、政府管教，万无一失。

我们的心情都大大好起来了。

但是，振儿在哪里？回来吧，饥饿的孩子！

我们得知振儿的下落，立马亲自把他送交派出所，请求收容管教，公安部门不收，说：“不够条件，构不成收容管教。”经我们反复写申请报告，说明自己的身份、处境，我们的具体情况，也说了受苏联《教育诗》的指引，认识到“问题少年”只有送交政府管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无限热爱党、信任政府，由政府管教是上策，孩子得以走正道，不会给社会添乱，给党抹黑，请求收容孩子，救救孩子……最终获得批准。这一过程，我没有参与，连送衣物我也没去，我没有勇气见儿子，怕自己动摇，我是母亲！

他还那么小，他有多大问题呢？不就是拧了公共厕所灯泡、拿了别人晒的旧棉毛衫裤到黑市换东西吃了？他还站在路口为别人望过风，他拿过家里的东西，他流浪不归，除此还有什么呢？公安局不收，父母为什么非送！？

那是个什么地方？真那么好？我们能去看看吗？眼见为实啊！可我们哪里来的权利？我们是在

“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再说，是我们“死乞白赖”要求送去的呀。

不，不能动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前途！这是对儿子真正的爱！我应该一百个放心！应该高兴，应该轻松，怎么反而沉重、郁闷？

我极度矛盾，思想一片混乱……

终于战胜自己。深信我们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符合党的要求。

我又随团出发了，不放心 14 岁的女儿留在青岛，让她到外地投奔亲戚去了，一家四口，分了四处，算上担心右派儿和媳的安危、焦虑致死的娘，便是四分五裂了。

忙于改造，顾不得伤心了。

振儿送到哪里去了，我不清楚，只知在本省的一个偏僻小城，音信渺无，料想不错，那里有政府的管教，阳光普照，那里的少年生活在欢乐的集体大家庭中，受着良好教育——这是《教育诗》中描述的。我们始终未去探望，右派身份，多有不便。两年后我俩先后摘帽归队，“回到人民队伍”。中敬改编《红岩》，取得成功。剧团在济南演出，休假日我们去看望振儿。如今我们已回到人民队伍，恢复了原工作，仍是导演、演员，去探望，振儿会脸上有光。

一位姓张的领导，接待了我们，是个非常朴实、热情诚恳的中年人，看了介绍信，得悉我们是黄小振的父母，连连道：“欢迎欢迎，好容易盼到了你们来，很想见见你们，请坐。”他让人去找黄小振。寒暄了几句，便道：“黄小振在这里表现很好。他刚来不久，就感到他与众不同，我们知道他是家长不止一次写了‘申请报告’主动要求送来的。我们这里，主动请求收容孩子的只有你们和一位老将军，老将军是亲自送来的，他的孩子未成年已陷得很深，小振不同……由于本质好，年龄小，怕被人教坏，我及时把他编入警卫班，和其他人隔离开，只学习文化时，才和大家在一起。警卫班人数很少，表现都比较好，只他一人这么小，他非常自爱。”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和我们像老熟人，这使我们感到温暖。我高兴得想掉泪。

小振进来了，见了我们，意外惊喜，却没有特别激动，有礼貌地叫了声爸爸妈妈，深深一躬，保持距离。中敬指一指带来的书籍和吃食说，这是带给你的。他一见到《红岩》、《欧阳海之歌》，眼发光，兴奋不已。连说谢谢，谢谢爸妈，又鞠了一躬，但见到难得买到的点心、糖果反应并不强烈。老张说，你们好好谈谈，我就回来，他和其他人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拉振儿坐下，细端详，他长高了不少，虽瘦，但挺健康。精神状态不错，和他交谈，明显感到长大了。我们和他谈自己的和团里的情况：摘帽、改编《红岩》、演出反映……他拘谨地汇报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吃饭时间到了，老张进来请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他把我们带的东西交小振，嘱咐：《红岩》不许传给别人看，只你自己看，包好书皮，尽量不在人前看，读完，交我替你保管好。小振连连道：是！欣喜地说爸爸妈妈再见，又鞠躬道谢：谢谢爸爸妈妈送这么好的书！（他似乎知道这书的价值）说完，连蹦带跳抱着书、糕点，开开心心走了。老张说：“你们看，他见书，多亲！这《红岩》在我们这里是禁书，因为写了‘越狱’，允许小振看，是对他的特殊信任。”他招呼别人去吃饭，为他留饭。

待室内只我们三人时，他一脸诚恳道：“我想见见你们，是因为我希望有机会亲自听你们谈谈，送儿子到这里来的真实思想，究竟为什么？你们的儿子，本质好，年龄小，出了一点毛病，怎么非送到这里来？还不止一次写了书面申请报告，是说明你们思想好觉悟高，家教严，还是孩子出了问题，自己不管，推给政府？我难以理解！”他的谈话如此坦诚，使我们意外，他分明在批评我们！他不同于一般公安人员。

中敬解释：我们不是推给政府，是信任政府。诚恳地说明我们的处境，具体困难，和《教育诗》的启发，说：“今天见到小振在这里这么好，很欣慰、非常感谢。”

老张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皱眉，说：“你们的情况我大体了解，小振很爱你们，尤其佩服爸爸。他认定你们真的不要他了，才会把他送到这里。你们应该想到，这伤害有多深。”我心里很不平静，

点头称是。他看周围没人，放低声音，快节奏地说：“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会如此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里是什么地方？大染缸！形形色色做坏事的少年罪犯有多少！我们能管得过来吗？他们互相交流，彼此学坏，政府怎么管得了这许多？你们不怕孩子在大染缸里受污染？小振现在挺好，应该说是本质好，当然，我们也出了力。我不是说这里的管教没有作用，有许多改得很好的少年，我们工作非常努力、很艰辛，是有成绩的，我是说……小振不应该送到这里来，他那么小，那么好，这里是大染缸啊！……”他一口气说了许多。

“这里是大染缸”！闻所未闻，我不理解，正待发问，他看了看表，说得更快，“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特别想问的是你们怎么没考虑孩子的前途，将来怎么办？这污点会影响一辈子！你们是大知识分子，是过来人，比我懂得多。我谈这些，出格，有失原则，作为公安人员、党员、领导，尤其不允许。我非常关心小振，太喜欢他，特别喜欢他的勤奋爱学习，这里图书馆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他那么聪明，单纯……我深怕这污点会、会影响他……为他担心、惋惜。这些话我已憋了很久，不吐不快，这掏心窝的话我不能对别人讲，更不能对小振提及，信任你们，无保留的直说了，我是粗人，说话直来直去，说得不对，请原谅。”吃饭的人们回来了，他戛然而止，意犹未尽，起身握手道别，我们反复致谢。

他的发自肺腑，“出格”的话，大大震撼了我们。一路上默默不发一言。我先开了腔：“他说得那么可怕，污点！影响他的前途！《教育诗》举了多少生动例子……他肯定没读过《教育诗》，这人心热，是大好人，但看问题有片面性，原则性不强。”中敬一直在思考，半晌，说：“他的话有道理、很有水平，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人，敢说实话、真话，这么大胆，难能可贵，这需要勇气，他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我很受教育，真得好好想想。”

一向看重中敬的看法，但此刻我没有完全认同他的想法，我以为我们没有做错。我当时思想上有多个“凡是”，其中主要的两条：凡是毛主席教导的，一定是真理，坚决照办，凡是苏联的，都是正确的，应该学习。我们做出的决定符合这两条，何错之有？

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被“改造”得人性扭曲，分不清是非，以非为是，还自以为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断送孩子的前途，却浑然不觉。只看到在这里儿子表现好，便以为前途光明，充满了希望，哪里想到日后的巨大打击，无尽的苦痛。

半年后，忽然接到通知：振儿提前回来。分外高兴，中敬出差不在家，我因排戏，不能到车站去接，傍晚时分在路口迎他，远远见他大步走来，我已止不住满眶喜泪，15岁的少年长大了，平头头，清秀，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穿了一件蓝色的小棉猴，干干净净，挺精神。到家，脱去外衣，一眼看见满身的补丁，不由得哎了一声，倒吸着冷气，问，这是你补的？他点头。天！泪再次涌出。振儿怕我难受，蹲在我面前说：“妈，我饿了，您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吃饭吧。”

“妈，我饿了。”深深刺痛着我。

晚饭后，没有多谈，见他旅途劳顿，让他洗洗先睡了，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这是我们全家的习惯，他还保持着。待他睡熟后，我把衣服拿到一边，数了数，衣、裤的补丁，大小小72个，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称得上精致，补丁色彩协调（他从哪里找到这些小布头的？），大的拳头大小，小的只方寸大，他是用心，费工制成的，令人惊叹！无法相信这出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的手。他在家从未动过针线，何时学会缝纫？竟缝得如此出色！我眼前浮现两岁多的振儿在秋阳下摆弄橡皮泥的景象，一旁的园长赞道：这孩子干什么都力求干得最好，他，优秀！

看着熟睡的儿子，想起被我刻在心上的儿时病房中撕心裂肺的一声“妈妈”，又不禁想起也被我刻在心上的，被我打跑时那哀叫的一声“妈妈”！再看看这72个补丁，痛定思痛，泪泉涌，湿衣襟。我是个狠心的妈妈！

待我看到眼前振儿仍是个什么都想干得最好的儿子，心灵手巧有才华的儿子，心里涌起了甜酸苦辣，甜的比重很大。那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前途充满阳光！我不再伤心。

我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一套草绿旧军装，放在他床头，这是好友蓝马相赠的，他个子和那时的振儿相仿，这位已是解放军领导干部的名演员，念旧，了解我们的情况，特意托人捎来送小振。年轻人谁不爱军装。

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已不少，振儿待客的态度很得体，既不低头回避，自卑不堪，也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他有礼貌地，微笑着回应关心他的人们，很有分寸，很懂事。他极少外出，只埋头读书，姐姐上学忙，爸妈工作忙，他抢着料理家务，除了烹饪，什么都会，成了家里的好帮手。人们用善意的眼光赞赏他，说这孩子原本就好。我欣喜地感到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儿子心灵受到的伤害，我们知之不多，抚爱更少。他从不提，怕痛，紧闭心扉。我们不问，爱护他、尊重他，却没有去帮他启开心扉，把受伤的儿子揽在怀里，细细看看心灵伤处，问一问疼不疼？用慈母的爱为他疗伤，告诉他，那是妈的错，原谅妈妈。而后，母子相拥痛哭一场，让孩子吐尽心头的苦水……

我却没有这样做！

当时，我们在为如何解决他的上学问题作努力，以他目前学业的真正程度，该如何插班……上学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他心心念念想的便是上学读书。可是久久未解决。

正在这时，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拉开了帷幕。

一贯听话的我们，毫不迟疑，积极响应号召，为黄小振报了名。敲锣打鼓，佩戴红花，欢天喜地，把振儿送到农村，在那里小振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被分配在非常贫困的莱西县的一个村。那时他17岁。“欢天喜地”，其实心有不忍，儿子受了那么多苦，年龄小。纵使我心怀“凡是”，也难免凄凄然！母爱使然。农村贫穷、农村苦，是人人知道的呀！不记得当时如何做通儿子的工作，他那么希望上学读书！不知他是否想：“还是不要我……”不，不，不会！他懂事。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教导。

女儿小明早已从外地接回。不久“支边”去了遥远的大西北——青海，她是写血书，自己要求去的。我的一儿一女“支农”、“支边”，听从召唤。

振儿在农村安家落户八年。那时，知青有许多是“常来常往”的，隔三差五往家里跑，并不常年坚持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小振全勤，除了春节回家，始终坚守岗位，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的知青家长常常想方设法捎馒头干粮和炸鱼炒酱，有时还有少许糕点、糖果。唯独小振没有，我曾动过心，中敬说，贫下中农吃得了的苦，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吃不了？搞特殊化！说服了我。小振的房东大娘问：“小黄，你娘是个后娘吧？”大娘想，不是后娘哪能不给瘦得皮包骨头的儿子捎点好吃的？她其实明白小黄的娘是亲娘，她是为小黄不平，她心疼。

小振在农村8年，勤劳动、苦读书，年年评为五好社员。自身的努力和家庭的影响，还因为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9年的知青生活，他除了劳动，只和书本相伴，想方设法寻觅文艺书籍，细读、苦读。在那年月刻苦读文学著作的知青是少有的，他接受了父亲的基因。他读书认真，为了加强记忆，常常把读过的作品、名著，细细讲给社员听，连外国名著他也改编成中国故事，如《基度山伯爵》，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讲得风趣生动，会抓效果、抖包袱，幽默感强，又会营造气氛，讲故事使他和农村老的、年轻的打成一片，听众很多，人人喜欢小黄，赞这个知青有大学问！他为缺少文化生活的人群带来快乐，也使自己快乐。讲故事使他受益良多，许多文学作品和中外名著因而留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后来知青陆续返城，先是“病退”，真病的、假病的，有医院证明又有关系的，返城了。以后政策放宽，大批知青返城了。没有关系没有后门的慢慢熬着吧。振儿自然留待最后。

振儿返城已是25岁的大青年。

街道办事处忙着为返城的闲散劳动力安排临时工作——打小工。振儿当了近两年临时工，干得卖力，反映良好，他在蛋厂干活儿时间较长，制作皮蛋。老工人师傅都喜欢他，每每看到他吃午饭时，躲到远离皮蛋的角落，吃着自带的缺油少肉的蔬菜和干粮，问：守着这么好吃的松花皮蛋，你怎么不吃两个？总有人扔给他一个又一个，他推说自己不爱吃，工人师傅剥了递给他，说明这不是多吃多沾，咱自己制作的，吃吧，没事。他没吃过一个，他不拿不属自己的一针一线。

过了许久，迎来就业高潮，“社会青年”（不是学生，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一片忙碌，佳音频传，知青就业的已很多很多，家家户户欢庆着。但，我们家没有动静！等吧，等着吧。问问街道办事处，回答：别急，别急，一定解决。再等再问回答依旧。母子在等待中熬煎，振儿早出晚归，仍打小工，晚上仍读书。他一定也悄悄哭。为了不影响中敬集中精力创作，我独自一天几次跑办事处等消息，热锅上的蚂蚁。傍晚，迎着下工回来的儿子，我避开他探询的目光，他不问。我心急如焚，背地里，无一日不哭。

一天又一天，我已感到大不妙，怎么啦，怎么啦？不是明告，这次就业，知青虽不一定人人有份，但原则上不会有失业……就业已接近尾声，依然无望。

终于，街道办事处的宋书记找我去，把我请到他办公室，我心狂跳，总算盼到了这一天！不知分配在哪里？只要有工作就行。宋书记请我落座，倒了杯水说：“张同志，别上火，我怕你急，想等有了结果，再告诉你，谁知至今没有结果。”我似遭雷击，一动不动……他从一旁拿出多张姓名栏里写着黄小振的表格给我看，说：“这都是为小振找工作发给几个单位的，全都退了回来，小振多次被‘退档’，开始我们想为他安排尽可能好些的工作，谁知一次次‘退档’。后来那些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小单位也一样‘退档’，我们做工作没效果。今天接到的是修缮队退回的，当泥瓦工也不要，太气人了。”

我屏住呼吸，问：“为什么？”

“当然是政审关。”

“是父母的还是他本人的？”

“都有关系，今年偏重在本人。”

“父母已摘帽，他本人，你了解，他……当年小，13岁……”

“我都了解，因为他好，我们尽力为他安排，但用人单位，信奉‘左比右好’，只看档案：政治有无问题，是否有污点，把好‘原则’‘政策’关！谁去研究分析具体情况？唉！小振的就业这么难！没人要！谁也不要！”这位书记是好人，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没人要，谁也不要！”大大刺伤了我。

我傻了！懵了！无奈、无助、无望，夫复何言！强忍着满腔苦水，晃晃悠悠来到离家不远的第三公园，躲在无人过往的旮旯，大放悲声，哭得地动山摇！我的优秀的儿子，没人要！谁也不要！

如何面对儿子？实话实说，告诉他？你，没人要！谁也不要！他从小能咬牙，这次呢？能经受这样的打击！这太残酷！

正哭得伤心，耳边响起：“你们真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污点影响一辈子！”清楚记起，敢说实话的公安人员，那个特别关心小振的领导老张，是他说的，他还说：“你们不考虑他的前途？”

——完全验证了他的正确。愧对老张当年的无情批评。我深感疚罪，无地自容，是父母毁了儿子的前途，咎由自取。哭吧，哭吧！哭倒长城，也换不来儿子的前途，也解决不了当前小振的就业。

为振儿我哭干了泪。

天无绝人之路！中敬去找了一位多年失意挨整的老革命，我们的好友王大哥，请求帮助（我们还能求什么人呢？），古稀老人冒着凌厉的寒风四处奔波找关系，终于传来好消息，小振被安排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就业。他开始有了工作，虽然很不理想，虽然是集体所有制，但毕竟他是工人了。

小振分配在最累最苦最脏的磨沙车间。不怕累不怕苦，他埋头苦干。单调而繁重的劳动很快适应，被称为黄师傅的小振完成任务又快又好。

车间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主动利用午休时间帮助车间办墙报、黑板报，写好人好事……文笔生动，工人们喜欢看，说黄师傅是秀才。逐渐被厂领导赏识，调至工会，为活跃工人的文化活动，他努力着。

从体力劳动转为办公室工作，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创作，写些小东西，发表在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内部刊物上，他写工人，唱工人，写他熟悉的。业余时间他参加市工人文化宫的文艺活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写独幕话剧、写小品、写相声，他还活跃在文化宫的舞台上，歌唱、朗诵、演相声、演话剧，他成了那里的骨干力量，是个多面手，多才多艺。忙碌异常，人际关系良好，他性格中活泼、开朗的一面得到发挥。

他快乐、兴奋地生活、工作着。

在工作和业余活动频繁的同时他刻苦学习，考上了青岛教育学院，以弥补正规学业的缺失、不足，成绩年年第一，他真的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

1977年适逢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以同等学力（不算当时正在读的青岛教育学院，他的学历是小学毕业）报考全国戏剧艺术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夜以继日地、玩命地读书，死记硬背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料，他的超强记忆帮了他很大忙。他满怀信心，鼓足勇气，偕同另两位也是话剧团的子弟，两男一女奔赴北京投考中戏，那位女生年龄小几岁，两位男青年都已30开外，是大龄考生。

振儿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自信，他虽在文艺圈中长大，但“戏剧文学”离他还是遥远的，前后近10年，他几乎没有接触。

我心里是打着鼓的。奇怪，我当时从未想到陪送他去北京，那里，我们在文艺界的熟人多多，我没有想过，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那时信息不似现在畅通，电话联系困难，他在北京考试情况无从了解。其间曾有人问及我们怎么不送去北京，不找找关系？这么大事，儿戏一般，让他独闯！我明白，这是说，“想法走走后门啊！”自然被我们否了。

我们接到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领导和中国儿艺名演员的王正、方掬芬夫妇传来口信，说，“这事不能掉以轻心！孩子来北京高考是大事，要过问！我们不要求额外照顾，只要求公正，不被别人挤掉！当前不正之风大行其道，不可不防，你们要‘过问’‘打招呼’，这样做，名正言顺……”好友话说得明明白白：“过问”“打招呼”，为的是防不正之风，不被别人挤掉。我们却迟迟没有反应，没有行动。

当我们得知“中戏”今年的主考官竟是我的老战友，同在华北文工三团的吴庚鉴，欣喜不已，而我们三团的老团长李超已是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这样两重关系，真可说是天助我也。赶快去北京，去打个招呼！什么活也无需说，便会是“上上大吉”。而我却犹豫，对中敬说：“此时此刻我若去北京，即便不是走后门，也‘无私有弊’啊！党三令五申不要走后门，要杜绝不正之风。我们‘过问’，‘打个招呼’，也属不光彩，不光明磊落！小振凭真才实学考取，堂堂正正，这多好！”转念又想，或许我们该去北京。“打个招呼”，也不是不正之风吧？我矛盾，但，依然没有行动，连一封求助信都没写过……我们真的是很“听话”的。

这时，没有通过二试的那位男生回来了，他极其兴奋地来报喜，详尽地描绘他们考试情况，说：“我们三位来自青岛的考生，受到中戏考官们的刮目相看，初试成绩都优秀。有人说：青岛来了三位秀才，黄小振最出众。二试，我由于不该出现的失误，没有进入三试。小振考得‘盖了帽’（青岛的流行语，特别棒的意思），写的作文，震动了老师们，众考官都打出高分，热情地关注着这个来自青岛的青年人，众人称他状元，挺轰动。三试口试是他的强项，肯定精彩。阿姨、伯伯，我说的是千真万确，有许多我是从内部知道的，非常可靠。小振金榜得中，绝无问题。”他绘声绘色说得眉飞色舞，仿佛他自己考中状元。接着他把小振的信，交给了我们，信中汇报的情况大致相同，比较含蓄，但踌躇满志，胜利在握，相信自己会成功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特别信任振儿，他不说满话，凡事留有余地。

振儿在高考中发挥得出乎意外的好，一片叫好声。不久，我们也得到内部传来的好消息。

全家喜洋洋，空气中洋溢着欢乐。

这不同于一般人家考上大学，这太不寻常啊！

以小振的年龄大、特殊的坎坷经历，近10年生活在少有文化的环境里，仅仅上了几年学，全凭自己从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不懈追求、奋发读书。如今竟然能在全中国一流的艺术院校——中央戏剧学院，且是难度最大的‘戏文系’的考场上表现得如此出色、出众，这是奇迹！

他从小的心愿，为话剧做贡献，10岁时就答应妈妈将来要干话剧！他渴望正规学习，尤其向往在文化中心的北京上大学，这些都一直是他的梦！此刻美梦将成真……

这好消息被许多人知道，虽然还没发榜，我们似已吃了定心丸。也有朋友告曰，“这样的时刻更应去北京，只要打个招呼！凡事没有完全定夺之前，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孩子本身成绩好，不存在走后门。”

我们始终没有任何“举动”。是相信小振的实力，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听话”，怕被人看成是行“不正之风”的人，丢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都有吧。

怎么唯独没有母爱特有的关怀，不曾想如何帮一帮，扶一扶，让儿子走好这关键的一步、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天有不测风云！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刹时，龙卷风突降！命运180度大逆转！黄小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意外的失败，几乎击垮了振儿，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结果！不是说这次高考，不看政审？那问题出在哪里？分明是胜利在望，怎么瞬间成泡影！

无缘去北京上大学，面临的现实：他必须回到那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或许和自己酷爱的话剧事业、戏剧创作永远绝缘……只能一辈子从事业余文艺活动……

这意外，不可理解！无法接受！

我们全被震昏了。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忙着写信询问了解不被录取的原因，真相。答复来得很快，看不懂，不明白，大意是该考生年龄稍偏大，分数要求不同，按年龄计算他差零点几分，按照另一种算法，他差一分多……（当时弄不明白，现在更记不清）反正相差的分数很少很少。即令这是真的，我如果去了北京……

后来得知主考官庚鉴也呼遗憾（他当时太忙了），待他知道这事时，晚了，帮不上忙了，这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也说：“怎么不说一声呢？这算不得走后门啊！”

我谴责、失悔自己“按兵不动”。没有在儿子需要拉一把的时刻，为儿子尽力。这拉一拉，关乎儿子的前途啊！

就这样，我打碎了振儿的求学梦！他多么渴望上正规大学，而这是最后的机会（超龄）！正待高飞的鸟折翅重重摔伤！

振儿在困惑中挺住了，他咬牙！性格使然。敢于面对现实，不沮丧、不低头，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对亲人诉说委屈、苦痛。他知道别人的家长去了北京，结局圆满，皆大欢喜。自己的父母没有“过问”。他多么想说：“妈妈，您如果去北京，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他什么也没说。

他内心深重的痛苦，不被人知，同样也不被父母知。这次的大挫折或许更甚于少年时期那挫折。他已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孩，他已年过三十！到了而立之年了。

我只看到了他的坚强，以此为骄傲，深为儿子能从阴影中大步走出来而欣慰，却没有感受到他受了重创，心在流血。

振儿白天在工厂努力开展工人的文化工作，下班后依然活跃在业余文艺队伍，夜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刻苦地学习写作。在这同时，他完成青岛教育学院的学业，成绩依然是最优秀的。他极力摆脱“落第”的伤痛，紧闭心扉，谈笑自若。他更努力了，在不短的时日子里，他写、他演、他唱……主演话剧

《于无声处》，而后又主演电视剧《残局》，他还自编自导自演相声，幽默风趣文学性强，无论唱、表演、特别是相声里的朗诵，那么动听，新颖，别具一格，包袱抖得响，雅，不俗，观众非常喜爱，大受欢迎。有人劝他从事相声……他快快乐乐地写相声演相声，也许借此化解心中的郁闷、苦恼。

他是努力的，他干一切都想干得好。

他的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家级大型刊物——《剧本》月刊。这，对于一个自学成才、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实属难得。他勤奋、多产，作品存活率高，频频获省、市级的奖项。

他显露的才华被市文联的“伯乐”相中，破格由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转入青岛市文联，专业从事文艺工作。当年市文联只有一个干部指标，给了他。

他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那已是1985年了。

1986年，他初次写的多幕话剧《四十不惑》发表于《剧本》月刊，大获好评。随即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演出（改名《惑》，观众反应十分强烈，引起轰动效应：全国三十多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名家的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荣获四年一度的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此奖后改为“曹禺剧本奖”，是戏剧创作的最高奖项）。小振受到极大鼓舞、激励。

曹禺先生亲自带领第四届的几位获奖者畅游湖南张家界等名胜地。在近距离接触中，得到这位戏剧大师的鼓励、教诲，使小振倍感荣幸。尤其是先生那么坦诚地回答小振和另几位青年人的唐突发问：“曹禺老师，我们斗胆想问您……您怎么那么多年没有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那样精彩的剧本……”“我们难以理解您这样的戏剧大师，怎么解放后的创作没有超越以前的作品……”

先生轻轻一笑，洒脱地说：“因为我太听话，太听话了啊！”

这回答出乎大家意外，谁也懂得这话的分量！谁也没想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戏剧大师会如此回答。接着，他又说：“年轻人，你们都是有才华的，你们会有很好的前途，你们一定要虚心，要多听意见，善于听取意见，要懂得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万万不能凡领导的话都听……”振儿回来，对我们提及时，很动情。

面对鲜花、掌声，振儿是低调的。他没有被捧晕。内心的喜悦使他对自已更加自信。他已近不惑之年，他需要更加奋发。

由于专业上的贡献，他连任两届青岛市政协常委。一连两届被评为青岛市“拔尖人才”（也称尖子人才，专业有贡献的优秀人才，享受市一级特殊津贴待遇。也是四年一届）。在市文联任青岛市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振儿已娶妻生子，夫妻恩爱，妻子极爱他，儿子聪明伶俐，家庭美满。小明四口之家，和和美。姐姐深爱受了许多苦难的弟弟，姐弟情重。我和中敬都已离休，我们和儿女这三个家庭，有幸都生活在美丽的青岛。全家人沐浴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天伦之乐。小明的女儿雷婷是全家的中心，爱读书的她，特别喜爱、仰慕读书多，讲故事特别棒的舅舅（她从小听着舅舅讲故事长大），一大一小有着共同爱好、共同语言……

振儿少年时期缺失的爱、温暖，如今，一股脑儿为他拥有。这样的日子使他满心欢喜！

正当全家过着难得的祥和日子，老伴病了。病中的他，和儿子进行倾心交谈，他说起，起初自己并不支持儿子从事创作：“写作风险大，时时处在风口浪尖，担心你经不住风浪！后来又怕你抵挡不了‘商潮’的诱惑！耐不住清贫，不甘于寂寞。现在我放心了，你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行！爸爸没有在创作方面给你具体帮助，没有为你喝彩叫好，对你要求太严，你不怪吧？有人说‘小振有个好爸爸’，言下之意是，爸爸为你捉刀，你大声回应：‘我爸爸没有为我写过一个字！’”

小振道：“爸爸，您给予我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够我受用一辈子。您的严要求和‘响鼓重捶’‘泼点冷水’我都能接受，您用心良苦，我理解。有您的榜样，我会努力写出更好的剧本，最近我写的多场次话剧《五.三〇大案始末》比《四十不惑》深刻，可能涉及敏感话题，目前虽已发表，反响不大，一时未必能演出。爸，我很想写针砭时弊的话剧，您得为我把关！我还想写有分量的喜剧，

我有喜剧潜力。”他为爸爸揩去眼角的泪，说：“您放心，爸，我是您的儿子，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您的血液……”他也不禁潸然泪下。

这次父子难得的谈心，使振儿大受鼓舞，他对我说：“爸爸夸我呢。”我想起两岁的他在幼儿园说：“妈妈夸我！”他多么在意父母的鼓励、夸奖！

老伴被诊断为“肺脑”。只一周，他，他驾鹤西去！

天翻地覆！

这灾难性打击，来得急，猝不及防，心碎肠断的我拒绝探望，不见任何人，包括儿女亲人。三个月，不会笑了。儿女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妈妈，这次迈不过这坎了？！

为化解我的悲痛，儿女们作了许多努力，无济于事。振儿求人录制了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为我播放，央求我看录像，陪同在侧，振儿了解爸妈都喜爱这个不凡的喜剧演员赵丽蓉。终于，赵丽蓉逗笑了我，我会笑了。我感谢赵丽蓉，也感谢孝顺的振儿。

半年后，我被邀去美国探亲，两岸相隔数十年，得来不易的亲情，亲人的欢聚、老娘亲和同胞手足的抚慰，温暖着我。但这颗破碎的心仍难安！时刻惦念国内的儿女，振儿的信常常为我带来快乐，他的信，情浓浓：“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即使在那苦难重重的年月，‘爱’也没变过色，我远比比，近看看，似乎很少有哪家像咱们这家如此互敬互爱，如此民主，如此和谐。您的儿女都是极爱您的，但比之爸爸对您的爱竟也黯然失色了，由于爸爸对您太好太好，我们便都相形见绌了，爸爸对您的爱是举世无双的……妈妈，爸爸走了，您的儿女后代将继承爸爸对您的爱，永远永远……”我是流着泪读完的。他在另一封信中告我：“国内时尚经商、下海。一些文人下海，弃笔从商。我不反对别人的选择，但我不，决不，决不放下手中的笔。日后即使清贫、寂寞我也耐得住。即使出了什么麻烦，我也挺得住。”小振的承诺说明他不忘爸爸生前对他的希望，是对身在异国他乡的寡母最好的安慰。

两年后，94岁高龄老母仙逝，哭别了娘，送娘上了西天，我回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伦之乐和朋辈的关爱，我的伤夫伤母之痛，渐渐平复、愈合。儿女们事母至孝，每晚不忘给独居的寡母打电话问安好。振儿亲昵地喊一声：“老娘，母亲大人，孩儿给您请安。”“妈妈，起风了，当心受凉，娘，保重，晚安。”我心里暖暖的。每每听到他唤着：妈妈、娘、母亲大人……格外开心。

振儿已人到中年，更趋沉稳。他人品好，办事公正，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精神，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一次政协开会讨论市领导作的报告，在小组会上一位常委发言，说，报告如何如何好，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领会精神……又一委员也作了相似的发言，赞报告很精彩，说学习这报告的重要性。小振耐不住了，口无遮拦，说：“赞报告精彩，谈体会、感受，都很重要，但这些可以在别的场合去谈。我想，委员们在这里开会，更重要的是，谈意见、谈不足，提建议，要起到监督作用，要献计献策。不能只赞好，泛泛谈感受说套话。”哑场。

在场的市委书记说道：“这是诤言！我们需要诤言！政府需要监督！希望委员们不要拘谨，多提意见、提不足，多多献计献策。我看，小黄说话大胆，不怕得罪人，这很好呀！”

我听别人提起此事，第一感觉是中敬的“敢于说话”已影响着振儿，父子一脉相承。这使我很安慰。

我很喜欢听别人夸振儿，对我谈他的一些故事，他自己是很少提及的。有些事情不大，颇能反映他的为人，我感兴趣。

那年“全国普通话比赛”在青岛举办，颁奖大会，请了不少领导，合影时，各级领导、大小官员被那些善于奉承的人员殷勤地请在前排就坐，并请参赛的年轻漂亮姑娘陪同坐定，而理应优先邀请坐在前排的辛苦的评委们，却被冷落站在后边。人群中有人高声道：“请不要忘了评委！他（她）们最

有资格坐在前排！他（她）们很辛苦，付出劳动最多，这里有位资深评委，带着有伤的腿，站了半天了，无人过问。不要眼里只有领导！”这声音惊动了全场，此人说毕径直走了。他不凑这热闹照这个像。这是一位亲历的评委告诉我的，她说：“阿姨，敢发出这声音的正是您的儿子黄小振！只有他会管这样的小事、闲事。”他的“打抱不平”“管闲事”是有点名气的。

振儿人是真实的，笔也是真实的。除话剧之外，写影视作品，也写儿童作品……他应邀写的农教片《金色的多来米》由于思维新、视觉独特，在全国三十多部作品中获一等奖（一等奖三名），第二次再评，被首都多位戏剧家、农教专家和中央电视台推为一等奖第一名（第二是上海第三是沈阳），他很看重这个小奖。

不久他约了两位写小说的朋友合作写三十多集的《金色海湾》，是当时青岛电视台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很受好评，影响广泛。

振儿自己感到写了十多年，虽得了不少奖，有了些进步，但还只是开始，自己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也欠缺，但他从不妄自菲薄，他自信，却不自傲。他看好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怎料，又怎料厄运又悄悄逼近、袭来……

振儿病！癌！肺细胞癌。医生宣判“晚期的晚期”，“不治”，“半年”……

山崩、地裂！天倾、海啸！

我似走到了人生尽头，处于伤痛、紧张和惊恐中，几近崩溃！几近疯狂！脑海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爱子被夺走！

救救儿子啊！救救他啊！老天何不公！

面对着床头柜上的老伴（老伴已在此相伴了八年），我惊呼老伴，老伴不应，痛呼苍天，苍天不理！

病中的小振除了消瘦、咳嗽、并没其它症状。他依然伏案创作；依然谈笑风生；依然爱看球赛，看到深夜；依然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依然在假日和哥儿们打牌打扑克；依然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请安。他让妻子照常上班，不必请假陪护自己……一切不都是一如既往？他，他怎么可能得了癌症！又怎能是晚期的晚期！

我每日去照料在家养病的振儿，母子相依相守，回避“癌”，从不提“癌”，深怕这层窗户纸被撕破。母亲节那天，相拥而泣，他道：“妈妈您已是古稀老人，怎能天天来照顾儿子！母亲节，我不能为妈妈去买鲜花、礼物，这几百元，请您自己……”他一定意识到，这已是最后的母亲节了，我想的是以后的母亲节，我还有这儿子吗？

依然回避“癌”。他有意把话题转向他在病中奋力完成的多集电视剧，他特别珍爱倾注了自己最后心血的作品。作品题名《没有扶栏的台阶》，是他对下岗工人充满的敬意——这些顽强的人群，不等待救助，没有扶栏，挺立着、努力着……我告诉他，许多人读了，大赞……他快乐地笑着（病中难得这样笑），说：“妈妈，我是含着泪，动情动心写的。我有潜力，给我时间，我会写出好本子，我需要时间！时间！”他已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静静地，良久，他似不经意地、轻柔地说道：“妈妈，当年您若是去了北京……”他扶着我双肩，停住了，空气凝固。他是怕年迈的娘不安、难受，没有把话说完。

我心咯噔一下，我明白，他心里一直装着这事！原以为他在人生道路上走得顺了，步子迈得大了，取得的成就是被人们称羡称道的。他不可能对那次的“遗憾”耿耿于怀。没料想，前不久，婷婷对我谈起，重病中的舅舅到北京看病，竟问起：“当年中戏为什么不录取我？”婷婷对舅舅有着深层了解，她说：“‘落榜’是舅舅心头的大结！他那么向往北京，那是文化中心，他渴望受到正规专业培训……他求学心切！他几乎没有上过学啊！他不满足如今的小小成就！他不是追求名利，不是想着成名成家，他是要求、希望自己能写得更好。姥姥，他心里苦啊！”

婷婷的一席话使我震撼！我大悟。失去那次机会，失去的是他一生的追求！理想！如果有那次机

会，凭着他的天赋加勤奋，他会有更大的出息！他有可能对话剧作出一点贡献！

此刻，他又提起这往事！我无言以对，心在流血。

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他始终没有住院治疗，甚至不卧床。一日，市领导在开会时得悉小振病重，开完会，市委书记、市长、人大、政协的头头五位领导，开着五辆小车集体来探望他。他们见到骨瘦如柴没有卧床的小振，齐惊呼，怎么不住院？围着他问病情，怪他为什么不汇报……市长马上批示：安排住院、或到外地治疗、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全部报销……

晚了！这病，回天乏力。

前后半年！振儿走了。他走得艰难，走得无奈！

“告别会”很隆重，相送者众。他至爱的亲人们来了，儿时的同学、插队的知青伙伴、朋友同事来了，领导来了。送别大厅里布满了亲友和机关团体相赠的花篮、花圈……

小振静卧在鲜花丛中，身着深色西服、白衬衣、花领带。仪容庄重、安详。他身上盖着的大红缎被是青岛话剧院的老阿姨们——母亲的老同事、老姐妹们围在母亲床上一针针、一线线，和着泪、哀叹着赶制的。她们都是看着小振长大的，她们了解小振是从深重的苦难和不幸中走来的，是从逆境中成长的。她们看重他，心疼他，她们要让这孩子暖暖和和上路，一丝不苟、厚薄均匀地为小振缝制这丧被。白发送黑发，长者何堪！何堪！

小振清瘦了许多，许多，却依然英俊潇洒，只嘴微张着，似有未说尽的话。

他走得那么艰难，那么无奈！分明在频频回首，泪眼相望着依依不肯离去的人们

振儿，我知道，你难舍！

你难舍！难舍这尘世的一切！活着多么好！生命诚可贵！你实实没活够！你还不到五十岁，不，不到四十九啊！

你难舍！难舍手中的笔！难舍你至爱的受了太多苦难的年迈寡母！难舍年幼的儿子，爱你的妻子，难舍手足情深的姐姐一家，难舍婷婷！在你已处于深度昏迷，弥留之际，婷婷从北京赶来，从机场直奔病房，惊呼、痛呼舅舅！舅舅！你流泪了，这是你留在人世最后的意识。人们说你是在等婷婷！

你难舍这一切……

面对着静卧着的振儿，我不啼哭，只痛泪大颗滚落，唯恐惊醒上路的儿子。八年前，也是在这里，送别老伴时是儿子搀扶着我的，他反复叮咛，劝慰：“妈妈，不要太伤心，要坚强，要克制，您是文化人，咱是文化人，万万不能失控，要让爸爸安心。”那时，我咬牙挺住了。而今，为了儿子心安，我咬牙挺住……

离我只咫尺的振儿，微张着嘴，他要说什么呢？

往事一字排开，一幕幕闪现，骤然，一蓬头垢面的少年低头站立，振儿！心一颤，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您真不要我了？”他要问的是：“为什么非送我到那个地方去？”

这折磨了他一生的“结”，至死未解开。

这是他心中深藏的痛，他不愿示人那难堪的一页，是他的至痛点，他回避，从不触及，也怕别人碰。

这隐痛，我知道，怕伤他，我小心翼翼。多少次，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啊！但始终未曾。最后那个母亲节，母子相拥而泣时刻，几度张口，我还是咽了回去，担心重病中的他，会痛上加痛。

他病中的寂寞或许也源于此，谢绝亲朋好友的探望，独自吞咽着往日的苦和痛！那“结”，仍时不时纠缠自己，他希望问个究竟！希望有人帮他解开这“结”。他没有提过。他不提不说，隐秘得更深。而人是需要倾诉的啊！

焉知癌的出现、突发，与此无关！？不是说，压抑、郁闷久压于心，会引发……

如今，振儿带着他的痛，走了。

我要直面振儿，回应他的“问”，我要帮他解开使他困惑的“结”。

我要告诉振儿：“改造”的痛苦、羞辱，你的父母最懂得、最明白，我们是过来人！见证人！我们无辜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迫强制“改造”。坠入“改造”深渊中苦挣扎的岁月，没齿难忘。

却缘何我们把你——亲生儿子，我们的独子，爱子，一个少不更事的，做了错事的小孩，主动送去“改造”！让你背着那沉重的污点，在心灵上经受更甚于我们的羞辱和苦痛！你是被你的父母亲自推入“改造”深渊的。并非被迫强制。

虎毒不食子！虎狼尚有父爱、母爱，动物也懂得疼爱自己的崽儿，绝不伤害它们。

有人性的人呢？我呢？我们呢？

我们——你的爸妈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爱你的父母，为什么伤害自己的孩子！？那么残酷！那么狠心！……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而自己竟荒诞地、愚蠢地，以为出于“爱”！

天底下有这样的爱吗？？？

苍天啊！

蓦地，变化着的振儿，一一呈现在眼前：

15岁的少年，穿着那件一针针一线线，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的补丁衣服，大步走来……

落榜后的他，奋力地在文化馆从事业余文艺活动的情景：他写、他演，他说相声时引发哄堂大笑……

他在北京剧场观看演出《惑》（《四十不惑》）时，剧场阵阵的掌声，使他感动不已的神态……

他在重病中，伏案，紧握笔写《没有扶栏的台阶》，字字行行写得密密麻麻……不停地咳着，写着……

——这是我的振儿！是一个勇敢者的形象！他的人生虽短暂，却没有虚度，苦难造就了他，他战胜了苦难。

他是我的安慰，我的骄傲，是我的好儿子！从小就优秀的儿子……

振儿远行了，渐行渐远……我没有哭。

振儿，原谅妈妈，在你离去后，触动你不愿示人的难堪一页，你的至痛点。我思忖再三，再三，再三……终于写出了你一生中不能、不愿、不堪提起的往事，我想跟大多数的人说出我对你的亏欠，我的忏悔，这真的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但我仍然是忐忑不安。

是写对，还是不写对？是写错，还是不写错？儿子，妈妈是不是又做错了？不，不，八十多岁的我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应该写！我相信，振儿在天有灵，他会说：

“妈妈，不要哭，别悲伤，这是时代悲剧，母子都受了伤害，谁写就的这悲剧，人人心知肚明。妈妈，我生前不敢面对，回避，是我的弱点、我的局限。爱我的妈妈，您写！这无伤、无损于我！而不仅仅为了我个人，那是时代的悲哀。妈妈我爱您！”

我深信这是振儿的心声。

【写于2008年11月，完稿于阴历12月20日（83周岁阴历生日）改毕于阴历正月15日元宵团圆节。（网友推荐）】■

专访 105 岁的老人周有光

瞭望东方周刊 北方朔 贾葭 灵子

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祖籍为江苏宜兴，1906 年生于江苏常州。经济学教授，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 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今年（2010 年—K 注）北京的三月仍属寒冬，在穆旦描述为“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不到六点钟，窗外便又冷又昏黄。前一天下起今冬第十场雪，平日喧闹的城市少有得安宁。胡同里三只小猫在四合院门口游逛，六只绿色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

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三十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五十平米，他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九平米大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九十厘米长、五十五厘米宽，漆掉了许多。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子打字机，便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105 岁的周有光坐在书桌前，笑咪咪讲起话来，开心的时候他会以手掩口，仿佛大笑失了礼仪。

他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了不起”。“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伊斯兰教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

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 Gan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

从宗教谈到文化，从文化谈到历史、政治、经济，三个小时过去，老人仍不觉疲倦。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要他下次再讲，他问我：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我婉谢，他说：那我还要再讲一会儿。

周有光出生于一九〇六年江苏常州青果巷。这条巷子很有意思，还住过瞿秋白、赵元任，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诗经》，两人那时结识，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

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要他拍一张西装照片寄去，他因为一直在常州，“土得很”，结果到照相馆戴了一个领带，又系上一个领结，成了日后同学必提的笑料。

周有光的专业是经济学，曾去日本留学，之后回国在大学任教，并曾任职当时“四小银行”之一的新华银行，派驻纽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美国回来。

“人家说我是‘左倾幼稚病’，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都特别爱国。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

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认为二十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天天“跑警报”。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但周围的人全死了。经历过打仗的苦难，他反而生出一种乐观精神来，建国之后接踵而至的反右、大饥荒、下牛棚、抄家……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小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一九五五年十月，年近五十的他接受上级委派，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一九五七年就“反右”了，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教授都是反右重点。他的好朋友、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他很好的博士生也自杀，他都不知道。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肯定要做二十年监牢。“我算是逃过了一劫，不然二十年下来，即便不死出来也没什么用了嘛。”

周有光在语言文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对。“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叶圣陶曾感伤地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举杯齐眉”，以示对彼此的敬爱。

张允和九十三岁去世后，周有光也做好准备。“我比她大4岁，她去世了，我想我自己也快了，所以把家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想不到活到现在。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一九八九年离休之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今年一月，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我一百〇五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他又笑起来。

问：《朝闻道集》里开篇就提出小康与大同的关系，您认为小康是现实，大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

周有光：假如我们研究古代到现代、西方到东方，会发现所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有理想出现。文化太低的时候，没有理想，只有迷信。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禹、汤、文王、武王等），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来，为什么？因为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指导我们往前面走，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

什么是小康？小康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不是一人一个月拿两千块钱，它是永远前进的实际的生活。我们要研究发展具体的生活，要发展经济，同时政治、文化也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问：那您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各占什么位置？

周有光：经济上，中国的农业化高度发展，但是工业化阶段落后于西方。今天我们的工业化有所起步，靠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就是接受外包，outsourcing，讲穿了就是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服务。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可是你不走这条道路起不来，印度也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他们是“世界办公室”。

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谈判了十五年，俄罗斯到今天谈判还不成功，它批判中国说参加 WTO 还不是受人家的剥削吗？是剥削，但是这跟老的剥削不一样。以前你什么都没有，所有好处都是我的，现在是你也吃到一点，虽然我吃得多你吃得少，但是你愿意受我剥削。外包就是让双方都有差价可取，实现双赢。

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在北大讲到均富，他讲错了。这是共富，不是均富。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要平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学不是道德学，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讲道德，大大饿死了。历史是不讲道德的，我们都是野兽变来的，都是人吃人的啊。

问：可是现在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贫富分化更严重了。

周有光：现在存在两大问题：贫富并不均等，贪污腐败严重。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发展了，四大家族把国家资产廉价买来，造成垄断，这是贪污；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发动政变把苏加诺时代打掉了，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发生裙带资本主义，这也是贪污；俄罗斯今天的百万富翁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头头们……中国也是一样的，国营翻牌变成私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都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很难避免的。假如搞得好，可以相对好一点。

现在大家讲中国崛起，我觉得还没有，只是初步的工业化。外包的成分里劳动力含量越多，外包水平越低，我们还在最低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在改，外包的技术要提高，争取占多一点份额，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今天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这两天报纸都在讲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愿意来。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就要提高工资水平，低工资的生产就包到外面去了。

问：您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吗？

周有光：信息化在中国也已经开始，但是今天碰到大问题了。Google 现在要退出中国，为什么一个民营企业要退出美国总统会出来讲话？这说明它不单单是一个公司的问题，也不单是科技的问题。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是五大自由，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网络不应该被控制。按照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保密了，因为信息化是一直伸到每个人家里面的，但是我们国家一定要保密，这就发生矛盾了。

我们是在往信息化走，但是当你可以接触到政府不愿意你接触的东西，政府就慌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办法就是把它拦起来，搞绿坝，后来搞蓝坝，比绿坝更厉害。我的电脑放在那边，原来能看的东西许多现在都看不到了，我家里装了卫星电视，现在也有很多频道看不到。但是 Google 退出中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花样，现在不是有 twitter 吗？Google 不是最后的东西，很快要被新技术超过。到时候要怎么应对？

问：那政治方面的发展呢？

周有光：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有民权国家，像欧美。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从政治发展来看，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所以摆不平，弄得不好要打仗。最近有人说现在的世界不是越来越太平，是越来越危险，但是怎么解决这个危险谁都不知道。因为历史没办法预言。

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就错了。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都是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这是马克思不能预料到的。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是剥削人的，事情就复杂了。

俄罗斯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到二战是中级阶段，二战之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去世太早（注：一八八

三年去世)，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否定，从实践上也被否定了。但是我们这里还在捧他，因为我们的旗帜不能拿下来。

问：按照您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

周有光：凡是专制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民主，不过我是乐观主义者，事情是慢慢来的，不要着急嘛。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我说中国有五千年，你们只有两百年，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急也没办法。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制定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订了一些很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实际上就是承认私有制度。我们说“搞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外国人就笑话，你们不是参加了世贸组织吗，哪里来的两个市场经济呢？可是我们要这样讲，安慰自己嘛。

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们跑在后面，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外国的研究说我们进入民主社会，最快需要三十年，最慢是一百五十年。为什么是一百五十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到现在就是一百五十年。可是假设我们能走得快，三十年也行。

问：什么条件下可以用三十年完成？

周有光：我认为有两个前提，一方面上面要开放，一方面群众思想水平要提高。有人这样说，中国政府里的重要人物本来都是没有文化的。毛泽东能写字作诗，但是没有现代文化。他有的是古代文化，是封建文化，所以他做皇帝了。邓小平去过法国，虽然不是留学生，但看过世界，就进了一步。另外群众水平要提高，现在一批批留学生回来，会有影响。有人说如果中国都是留学生了，那个时候就好办了。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从美国回来照样有私心，有了权照样会贪污。

37

问：不丹的民主实践似乎证明未必需要民众素质的普遍提高？

周有光：不丹 2007 年竞选成立新的国会，留学归来的国王主动推行限制自己权力的民主改革。有人问不丹国王，百姓没有要求民主，你为什么要搞民主？他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必须推行民主。”不丹国家小，国王有威信，讲了话百姓信任。但是大的国家情况复杂，势力太多，你不做国王我做国王，改革搞不成功。

问：文化方面呢，中国是否从玄学进入了科学阶段？

周有光：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举个例子，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是玄学，没有实证，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还在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太阳颂歌，是原始自然崇拜，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啊。

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上跑到了前面。我们不敢学民主，只学科学，科学还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比如经济学，中国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共产主义否定资本家，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可现在连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创造。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发展成为许多门学科。苏联把资本家都杀光了，没有人管理，所以经济失败。

我有朋友在中央党校做教授，他把中央党校的教科书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哈哈大笑。外面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讲的很多是凯恩斯。这个应当说是进步，社会科学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可我们还不能这么讲。

社会学，这是阶级性最强的，我们不学。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并非只能你死我活。但“历史唯物主义”否认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门学问，我们更是

在文革之后才重建这个学科，比苏联晚二十多年。

政治学，现在变成许多门管理学。按照新的政治学理论，全世界的官只要百分之一就够了，电脑可以代替许多官。中国有七千万的官，可按照这个研究，七百万都太多了。

教育学，我们的教育糟得不得了，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来，大家希望他做一点好事情，可是他做不出。为什么？不是他不想做好，这个牵扯到我们的整个制度。现在中国教育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大学没有学术自由，都是做官的人管理，荒谬到大学里搞行政工作的处长相当于教授。第二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中小學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比如来一个大人物，学生就要出去列队欢迎，这怎么可以？

问：您认为我们现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得还远远不够？

周有光：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时期就了不起了，但是后来开始衰落。汉代有印度佛教传进来，经过了几百年演变，到唐代与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混合起来，这是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时期。许多好东西都是印度文化带过来的，比如中医、雕塑、建筑、歌舞等等。到了清朝又有西洋文化的嫁接，这是第三个时期。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

改革开放之后季羨林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八十五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東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

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

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

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时代，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

问：您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讲得不好，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他们有自动的要求，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失去“母亲文化”很久了，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于丹碰上这个时期，一下子成了红人。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问：现在有学者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您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五十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从历史来看、理论来看都是这样。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的工

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更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 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 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人家今天学中文是好玩嘛，等于学唱歌跳舞一样，要学到能用的程度还不行。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想 21 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问：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北朝鲜发动的。后来第一版就没写这个条目，一九九九年第二版我们尺度放松了，同意是北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所以我们是进步的。

问：按照全球化的思路，将来的历史都要重新写，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尤其需要重新评估。比如我们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但这个理论已经被证明失败了。

周有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的。我们一直不承认这一点，只说是戈尔巴乔夫不好。苏联垮台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在当地，发现没有一个人表示惋惜。苏联垮台之前大家举手拥护共产党，垮台之后大家又都举手反对共产党，说明之前的拥护都是假的。所以叶利钦宣布俄罗斯独立，说“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前提”。他想清楚了。

根据外国的研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空想，资本主义才是现实，这就像我们说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现在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要重新研究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面四个是现实，后面一个是理想，性质不同，不能成为并列阶段。历史没有终点，以共产主义为历史的最高阶段，不合逻辑。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工业社会主义化，大饥荒，大清洗，证明此路不通。

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饿死、被杀害的非自然死亡人数七千万，新的国外研究是八千三百万，多出来的一千三百万是什么构成，我还没有找到材料，但是外国杂志上已经这样讲了。就算七千万，也不得了啊。香港曾经有评论说中国大陆很幸运，因为第一毛泽东死得早，第二毛泽东没有儿子，不然像金正日这样中国还要继续倒霉呢。苏联是饿死六千万，但是它人口少，比例比我们高。所以苏联自己垮台了。

我们提的几个东西是对的，拨乱反正、与时俱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确做了不少好事情，这要承认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救了共产党。他上台的时候中国穷得不得了。许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到了经济破产的边缘，这句话不对，早就已经破产了。我在北京，是政协委员，应该算是特殊阶级了，但花生米都吃不到。我家里面有母亲、孩子、几个保姆，粮票都不够用。人家说政协有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可以同夫人一起去吃。我们就经常去，很滑稽的是，每天碰到溥仪一皇帝的粮票也不够！这还不是破产吗？

问：中国从前是亲美的，后来转而亲苏，您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周有光：中国的传统一直是亲美，胡适这一派都是中国老的传统。所以后来共产党忽然要反美，

连胡适都不赞同。陈独秀跟胡适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胡适说哪里有帝国主义？中国一直没有反帝传统。美国一直是帮助中国的，它的门户开放的确是叫世界共同剥削中国，但是没有瓜分中国，把青岛还回来了。可是外蒙古却被苏联拿走了。有人说，苏联要掀起世界革命，中国是亚洲最理想的发展对象，所以它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和革命思想的渗透，策动中国反帝。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学就是美国人办的，后来也在美国生活。你假如骂我迷信美国我也承认，问题是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不行。我要迷信苏联迷信不了。它许多重要的东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毛泽东可以，他没有现代知识，他连钢铁怎样炼成功都搞不清楚。改革开放以后，报纸登出来北京小学里老师问小学生，厨房里能炼出钢铁吗？小学生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温度不够。这一点毛泽东就不懂嘛。他想法很简单，国家要强就要有军火，军火多要有钢铁，钢铁很容易，一个人搞十斤钢铁，全国加起来比美国就多了嘛。这不是开玩笑吗？

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夜里发现车两边都像白天一样火光通明。那时候因为这个把长江两岸的树都搞光了。从前能保护森林有两个道理，第一树有神，不能随便砍；第二树是地主的，砍了要给钱。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很快长江两岸的树都砍光了，长江黄河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长出来，一百年也不行。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我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他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做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一百〇五岁。能不能活到一百〇六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死不能说今天死明天还要死，死是一秒钟的事情。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

【网友推荐】■

再访 106 岁的睿智老人周有光

瞭望东方周刊 北方朔 贾葭 灵子

“厚今”是重要的，但古代的好东西不要丢掉

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当然怀疑不是胡乱怀疑，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独立思考。

再次敲开周有光老先生的家门，他仍然坐在那张掉了漆的小书桌前，与寒冬季节的那次拜访一样，

笑眯眯等着来客发问。

他大概并没弄清楚来人是谁，也不多问，但显得很欢迎，已脱落眉毛的眉骨在眼睛上方明显弯起来。仿佛他已习惯了这样的模式，接受各个领域的问题，尽力给出自己一百多岁的生命里思索出的答案。

早年他曾参与《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纂译介，晚年倒果真成了“周百科”。来来往往的困惑者在这九平米的小书房里一再驻足，期求寻得焦灼生命中的一片清凉。

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

周有光：我们曾经搞得很乱，后来改革开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社会要搞坏容易，搞好不容易。根据我的体验，许多不合理的荒唐的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慢慢地改，一直改到90年代才差不多了。90年代以来这十年我们发展也快得不得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有好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中国人素质还是好的，文明古国嘛。

新中国60年里前30年破坏得太厉害，带来许多问题。这是奇怪的，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发展越快问题越多，好多东西都是利弊共生，这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种规律。

《望东方周刊》：对现在媒体经常报道“假博士”的问题您是什么看法？

周有光：这是一种道德水平的下降。中国人的传统是诚信，孔夫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很重要的。现在到处是假的东西，甚至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是抄人家的文章，这种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这个事情应当说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发达了，但媒体还没有充分的自由，报道还有顾虑。一有顾虑，就会造成一种起哄的风气，就不是思考了。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坏事情都会慢慢变好，但是乐观不等于喜欢坏事情。我认为坏事情应该很严重地批判。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人住在韩国几十年，年老回国之前写了一本书，把韩国一棒子打死，把坏事情讲出来。想不到这本书出来之后一下子卖了几十万部，起哄得不得了。韩国人自己跟着他揭露坏的事情。

这个新闻上海《解放日报》报道得最多，总题目是“韩国不怕骂”，国际上都评论，一个国家不怕骂才有希望。不许讲缺点是缺点当中的缺点。

《望东方周刊》：在您看来，一个国家怎么样才更容易取得进步？

周有光：这有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要有开明水平，二是群众对于民主的认识和要求。

民主是要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制定许多法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定了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从历史来看，不是私有制落后于公有制。不丹这样的小国家走民主道路，不是群众要求，而是头头们到外国留学去了，有了新的思想。很多小国家都是这样实现民主的。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以前一个中东国家非常保守，它的王子王孙都到英国留学，回来之后看不惯本国的状况。老国王去世了，新王子接班，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电视，新国王要求发展电视事业，大臣们都反对，说这是魔鬼的诱惑。王子说好吧，你们都回去吧，下次再谈。大臣们走出王宫，发现汽车没有了，回去问王子。小王子说，汽车也是魔鬼的东西，你们要它干吗？哈哈。后来电视就办成功了。

所以要想进步，认识是很重要的，能认识到它是对的，就很容易取得进步。另外一方面，不能单靠群众自我提高，要靠有水平的人出来提倡。

厚今而不薄古

《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两个东西被批评比较多，一个是中医，一个是武术。

周有光：中国的武术是有它的特点，但如何发扬？运动方面的比赛最高级别的是奥运会，奥运会以前是没有羽毛球的，这是印尼搞出来，后来提高水平，经过国际认证，就变成世界性的了。中国的武术应该走这条道路。

什么东西都要走世界性的道路。你另外搞一套，不让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是不行的。

《望东方周刊》：那么汉字呢？现在电脑输入拼音已经很方便了，书写难度几乎已不再是恢复繁体字的障碍，所以台湾不少人呼吁恢复繁体字。

周有光：要恢复繁体字是不可能的。马英九反对在台湾搞另外一套拼音，赞成用大陆的拼音，这点事情他做对了。可是他要提倡繁体字是不对的。

蒋介石也是提倡简化字的，公布简化方案，是南京第一个做的。不过那时公布以后，反对的声音太大，第二年就失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还在提倡简化字，但是我们大陆是搞简化字的，那时台湾是共产党搞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结果后来台湾就反对简化字了。

我讲老实话，这个反对是台湾文字学发展水平不足的缘故，因为他们不许发展文字学，这样子他们就落后于我们。我们在文字学、语文工作上面一直还不错。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得慢慢地做，因为这不是容易的。比如提倡普通话，原来叫国语，名称是无所谓的。原来很困难，到了90年代普通话的提倡基本成功了。一方面是慢慢地积累，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没有搞错。

现在有些批评，是因为凡是共产主义提倡的他就反对，这跟文化工作本身是两回事。我现在不跟外界往来，以前有台湾的学者过来我就跟他说，语言文字我们从学者的方面来解决，学者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不要把它跟政治混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许用繁体字嘛，一种古文字当然要学，还有人学甲骨文呢，而且学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不要古的，只要今的。以前有人提倡要厚今薄古，我是提出厚今而不薄古，“厚今”是重要的，但古代的好东西不要丢掉。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

《望东方周刊》：前段时间媒体曾经爆出道士李一利用“神仙法门”大发名人财的事情，为什么他能欺骗那么多所谓“精英”？能否请您谈谈与之相关的信仰缺失的问题？

周有光：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说亚洲人创造许多宗教，欧洲人创造许多主义，这都是信仰。可是从信仰宗教到信仰主义，是前进了一步。因为信仰宗教，那是一个想象，毫无根据的。主义是有哲理的，是哲理信仰。可是还有第三步，是进步到科学。

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了。

一个民族多数人的思想会经历三个步骤：神学思维，就是信仰宗教；玄学思维，就是各种主义了；科学思维。科学的好处是希望人家骂，你骂不倒它，它就是真理，所以它站得住。而且科学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是一元的，而宗教不同的教派，主义不同的流派，都是不同主张的。

当然，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

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这三步的发展非常重要，你能掌握这个规律，观察很多事物你就明白了。

《望东方周刊》：这么说您认为宗教相对来说是落后的？

周有光：从科学的角度看，玄学是落后的；从玄学的角度看，神学是落后的。前苏联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所以它就反对宗教嘛。结果苏联一垮台，大家都跑到教堂里面去了。什么道理呢？外国评论家提出一个观点：它拿不许怀疑来反对不许怀疑，当然是失败的。因为苏联搞的那一套还是玄学，不是科学思维。从这一点来看，叶利钦这个人还是有眼光的。在欧洲有人问，你把苏联搞垮了，你懊悔不懊悔？他说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前进的必要条件。

现在之所以那么多人选择宗教，很容易解释。他们有种精神的苦闷，人不仅要物质的生活，还要精神的生活，他们精神没有寄托。讲老实话，我们今天许多人会发生精神苦闷，有一部分人就想用宗

教解脱自己。

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但一直不信教，但是抗日战争中我有一个七岁的女儿患盲肠炎死去了，因为打仗的时候医院条件不好。这个给我的打击很大。那时候来了一个朋友，是冯玉祥的秘书，他娶了位信基督教的太太，自己也信了基督教。他说你精神痛苦，可以有一个安慰的方法，可以受洗礼入教，我就跟着他五分钟受洗礼，吃一块小小的面包就完了。

但我是一个理智主义者，真正让我信教很困难，要我每天吃饭祷告就办不到。所以我形式上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相信。一个有深入的科学思维的人要成为真正的教徒是很难的。

《望东方周刊》：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对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有什么借鉴作用？

周有光：可以这样说，现在世界的教育，主要都是基督教教会办起来的。欧洲比较古老的大学有六百年，都是教会主办，几乎没有例外。所以宗教的迷信与迷信里面产生的思考、真理，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先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里生产出来的，都是慢慢变成了先进。

现代教育发展了六百年，从两千年的整个教育史来看，教会推进教育、推进科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基督教为什么能这样子呢？它经过了宗教改革，前后闹了差不多五百年，之前教会腐败得不得了，很多荒谬的事情，后来一步步改革。原来天主教是保守的，新教三大派是比较进步的。改到现在，天主教也是比较进步的了，与新教没有多大分别。从这个历史来看，是从黑暗到光明的，是从落后到进步的，是从愚昧到智慧的。要一步步前进。

什么叫进化论的思维？进化论是了不起的，不仅用之于自然现象，也可用之于社会科学。我们今天于自然科学已经没有问题了，苏联一度自然科学都不要，要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后来都失败了。我们今天引进了自然科学，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只引进了经济学，其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将来会慢慢开门的。“民国热”有它合理的一面，有它不合理的一面

43

《望东方周刊》：现在兴起“民国热”，民国题材的书籍很畅销。感觉民国时期文化很繁荣，您的文化功底也是在那时打下的。您怎么看现在兴起的民国热潮？

周有光：“民国热”有它合理的一面，有它不合理的一面。

合理的一面，现在全世界有一股历史学热，国外的讲法叫做全球化历史学。比如香港杂志就讨论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谁发动的？大家都说是德国发动的，但并非如此，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他们定了密约瓜分波兰，瓜分欧洲。一个国家发动和两个国家发动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全球化历史学是要把历史重新解构，中欧许多国家最起劲。

中国历史也在改变。比如太平天国，过去国民党捧太平天国，因为它反对满清；我们捧太平天国，因为它是农民革命。现在知道这两个看法都错了，太平天国是非常落后的，给中国带来很大破坏，不是好东西。特别是《辞海》，以前说“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成了“天平天国运动”。所以假的、错的历史要改正过来。

现在重新想起有一个民国时代，是对的。可是错的呢，是另外一方面：许多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我们这些人当时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是专制的，共产党是宣传民主的。**

那时我在重庆，周恩来每月开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我每一次都参加的。周恩来每次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走民主道路的，所以青年都左倾，反对国民党？？

所以，所有历史上错误的东西都要纠正过来。司马迁了不起，他的历史观念是比较客观的，所以《史记》到今天还是了不起的东西。

《望东方周刊》：民国时期您在新华银行工作，这是当时有名的私有银行。

周有光：解放前中国跟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国民党是要走资本主义这条路的，同时国民党是亲美国的。

当时银行主要是两种，国家有四个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主要是国家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民间的。其他都是私营银行。那时候上海是经济、文化中心，有四个银行是私营银行里比较有水平的，叫四小行。新华银行是当中一个。

那个时候中国什么都要学美国，美国银行业最发达，上海的银行事业跟美国差别很小，水平很高的，那时我们已经进入支票时代了，现在好多人都不懂什么叫支票。解放以后我们改学苏联，苏联的银行业是最糟糕的。最近二十年改了很多，应该说进步很快。

银行是个很复杂的机构，糊里糊涂的事情是没有的。后来银行事业搞得一塌糊涂，经济也被破坏。我们也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慢慢上轨道，可是从技术上面讲，今天还是跟美国差距比较大。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嘛，银行都是国家的。我们也有几个私营银行，是不太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开放”两个字，新加坡这样小的地方有一百多个外国银行，情况很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大银行由国家统治，同时发展民间银行，这个政策是对的。但也要开放外国银行到中国来办分行。

《望东方周刊》：您这么长寿有没有秘诀啊？

周有光：长寿有秘诀，很简单。第一条，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可以喝点啤酒；第二条，生活要正常，许多人的健康搞坏，就是自己搞坏的，没有按照科学道理来；第三条，不要生气，度量要大。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它好的一面，坏的一定会慢慢过去。

一方面等它自己变好，一方面也要做工作帮助它变好。有的事情要快一点，可是（有些事情）快不了。

我的话你们不要都相信，这不是客气的话，因为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当然怀疑不是胡乱怀疑，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独立思考。所以苏格拉底了不起，他的教育就是一句话：知道你自己。■

“旧歌”与“红歌”

何蜀

曾经有过一首配合阶级斗争教育的“新民歌”：“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其中的“什么时代唱什么歌”，有一定的道理——除了一些作为人类文化瑰宝而长期流传的名歌以外，不同的时代，确实有反映不同时代面貌、代表不同时代精神、体现不同时代特色的歌曲。

我母亲曾于1945年至1946年在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就读了两个学期，她收藏有当年的几本歌曲集，其中一本是《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初中音乐 唱歌》（第三册，第三学年用），编者：朱稣典、吕伯攸、邱望湘、徐小涛。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二十六（即1937）年初版。此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练习，分为：音阶练习，调子练习，音程练习。第二部分是歌曲，有：

《作新民》，编者作词，歌词为：放开了胸襟，解除了烦闷，我有堂堂七尺身。奋起奋起，迈步前进，准备双肩担重任。放开了胸襟，解除了烦闷，从今努力作新民。

《云山》，辛弃疾《玉楼春》词（何人半夜推山去……）。

《秋夜思乡》，清·黄燮清词，编者作曲，歌词为：客衣单，人影悄，越是天涯越是秋来早，雨雨风风增懊恼，越是黄昏越是虫声闹。别情浓，归梦渺，越是思家越是乡书少，一幅疏帘寒料峭，越是销魂越是灯残了。

《秋晚》，清·赵我佩词，编者作曲，歌词为：芦花边，蓼花边，曾记横塘唱采莲，秋风年复年。

暮云天，暮潮天，柳外轻丝荡细烟，沙鸥和月眠。



《老槐树》，舒伯特曲（当时译作修陪尔特，歌谱后附有“写谱时的修陪尔特”插图），编者作歌，歌词为：故园中有株老槐，念先人手泽可爱；忆儿时树下嬉游，碧亭亭如伞如盖。自离乡负笈远方，弹指间已三载。叹归来人事几沧桑，喜繁枝葱茏犹在，更浓阴绿上庭阶。

《夜织》，外国乐曲，编者作歌，歌词为：小窗夜色苍茫，一灯如豆夜正长。窗前有女停机杼，时而叹息时彷徨。记得去年今夕，阿父从征赴朔方。岁月不居音信杳，频陟岵兮劳瞻望。咚，咚，鼓声遥闻，缅怀绝塞更凄凉。纵声一哭恐惊母，偷弹双泪落衣裳。（歌谱后附有一幅丰子恺风格的插图“一灯如豆夜正长”。）

《夏初临》，外国乐曲，编者作歌，歌词为：梅雨过，夏初临，麦秋天，在水边，满池荷叶大如钱；绿荫添，夏初临，乱红稀，柳丝牵，在树颠，枝头夕照噪新蝉。渐觉炎蒸人意倦，薰风吹上碧栏杆。在秧田，在草间，蛙声萤火透疏帘。

《莲花》，莫扎特曲，胡寄尘歌，歌词为：一泓清水，半亩方塘，碧云深处仙乡。浅红晕颊，嫩绿裁裳，出水芙蓉雅淡妆。悠扬，映斜阳，果然绝代容妆。远香，宜晚凉，果然绝代容光。仙姝萼绿，高士花黄，洛阳佳种称王，谁能比汝，君子名芳。

《工人合唱》，韦柏曲，编者作歌，歌词为：举起铁腕来生产，斧锹锤凿作伙伴。天生一副好筋骨，从来不偷懒。耸起双肩担重任，扛挑背负都会干。早晨做起做到晚，才算真好汉。我们开发宝藏，要把地层凿穿，我们尽力建设，谋生活方便，我们供给需要，造成器物万千，为求大众幸福，不怕流血流汗。

还有《野营之晓》，《忆亡友》，《梦境》，《除夕》，《梅》，《暮春》等。

这本教材后面附录了古诺、门德尔松、比才作曲的三首外国名歌。

母亲收藏的老歌曲集中，另一本是钱君匋编《中等以上学校教科适用/北新歌曲》，北新书局印行，民国二十二（1933）年八月初版。

这本歌曲集缺少几页（估计是为避免被斥为“反动歌曲”而撕掉了），余下的，除去几首现代歌曲如《卖布谣》（刘大白诗，赵元任曲）、《建设与读书》（沈秉廉歌）、《劳动歌》（词见《星期评论》，赵元任曲）外，以古典诗词谱曲的歌占了大部分，如：《从军行》（古乐府：白日依山望烽火……），《钱塘湖春行》（白居易诗），《鹧鸪天》（黄庭坚词：枝上流莺和泪闻……），《木兰花》（欧阳修词，原词牌《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

《四月十七》（韦庄词，原词牌《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红满枝》（冯延巳词，原词牌不详：红满枝，绿满枝……廖青主曲。），《春景》（欧阳修词，原词牌《阮郎归》：南园春半踏青时……），《金缕曲》（劝君莫惜金缕衣……），《塞下曲》（“鹞翎金仆姑……”、“林暗草惊风……”、“月黑雁飞高……”、“野幕敞琼筵……”等）。

此外还有《雁》（露西亚民谣），《久，久矣哉》，《雪》，《幽境》，《晚眺》（门德尔松曲），《黄昏海边》，《悲秋》，《泉水》（韦柏曲），《夏日之歌》，《寂寞的海塘》，《握别》，《月》等，都是歌唱大自然及亲情、友情的。

还有四首李叔同作的歌：《长逝》，《思童年》，《西湖》，《梦》。

我母亲另外还有自己以毛笔小楷在学校印发的五线谱上手抄的歌曲，其中有：

《雁语》（波西米亚曲），《秋声》，《点绛唇（赋登楼）》（王灼词，黄自曲），《满江红》（岳飞词），《民族号手》（爱尔兰民歌），《红豆词》（曹雪芹词，刘雪庵曲），《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小夜曲》，《枫桥夜泊》（张继诗，刘雪庵曲），《春夜洛城闻笛》（李白诗，刘雪庵曲），《花非花》（白居易诗，黄自



曲)等。

从这些歌曲内容可以看到,在三十至四十年代,除了那些鼓动民众抗日救亡精神的抗战歌曲外,中学音乐教学中所教的主要是帮助学生认识大自然,歌唱亲情、友情,培养美感,陶冶情操,开启心智的歌曲,其中又以古典诗词谱写的歌曲和外国名歌为主,有的以外国乐曲填词(当时称为“作歌”)的歌曲,歌词也是传统诗词风格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宣扬和灌输政治意识形态的歌曲。

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小学二三年级(1956、1957年)时,学校教唱的也有些帮助少年儿童认识大自然、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歌曲,如一首歌唱春天的:“蝶儿飞,鸟儿唱,春天来到百花香……”旋律欢快活泼;一首关于秋天的:“秋天已经来到,树叶枯黄了……”旋律低沉忧郁,有点像外国歌曲;一首关于自然界“夏夜晚会”的:“呱呱呱呱呱,青蛙大哥会唱歌,滴铃滴铃铃,蟋蟀大姐会弹琴……”反复模仿了几种草虫的歌声后,快活地唱道:“夏夜晚会开始了!”(歌词已记不清了)充满童趣,旋律简洁明快,优美动听。但是此后就再也不记得有这样的歌了。后来学校教唱了些什么歌呢?印象较深的有:

“苏联卫星高飞在天空,和平宣言深入人人心,我们欢呼人类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力量大无穷。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不准帝国主义再逞凶。全世界都站在我们这边,看东风压倒西风!”

“党中央发出总路线,全国人民齐动员,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加油干,我们要作促进派,嘿!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

“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来说好呀,背后来破坏!见了太阳他说黑暗,见了幸福他说悲惨……”

“比比谁先进,看看谁的干劲大。多出一把力,多流一滴汗,生产战线比个高下。你跑得快,我赶得快,你掉了队,我把你拉。快马加鞭人人向前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生产跃进又跃进,看谁的干劲大!”

“五年计划看三年,苦干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要不了十五年!嗨嗨嗨嗨嗨、嗨,十五年!十五年!嗨!嗨!十五年!”

“小斑鸠,咕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同我吃的一锅饭呀,跟我睡的一个屋。白天下地搞生产,回家扫地又喂猪,有空教我学文化,还帮妈妈做衣服。妈妈问她苦不苦,她说不苦不苦很幸福。要问她是哪一个,她是下放的好干部。”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当时配合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政治运动,都创作有一些歌曲,如果把那些歌曲集中编在一起,就基本上是一部完整的“当代政治运动史·歌曲编”了。

我在母亲留存的当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歌曲》杂志上看到许多这样的歌,比如——

因为大饥荒,人民公社遭到质疑,“三自一包”受到欢迎,就有了歌唱“集体生产优越无边”,人民公社是“一条大道在眼前”的歌,歌唱“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就有了鼓励小学生从小立志“长大要把农民当”的歌,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歌,甚至还有歌唱抽水机、歌唱插秧机、歌唱柴油机、歌唱小镰刀、歌唱小算盘、歌唱喂猪、歌唱积肥的歌……

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后,就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的红旗迎风摆。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建设新时代……”

“四清”运动开始后,就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哎,贫下中农挺起腰,三面红旗举得呀高,歪风邪气要扫尽,牛鬼蛇神要打倒,阶级队伍组织好,永远革命向前跑!”

党中央强调阶级斗争教育了,就有了关于“忆苦思甜”的“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其实当年许多这类“忆苦思甜”会上老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诉说起大跃进之后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苦。)

还有那首如今被一些歌星唱得软绵绵甜蜜蜜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送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其

实这是一首配合当年阶级斗争教育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忆苦思甜”歌，只是现在通常都只唱前面这几句抒情片断而不唱后面的诉苦内容，无人知道其原貌了。

当然，那些歌唱毛主席、歌唱毛主席著作、歌唱毛主席语录甚至毛主席语录板的歌就数不胜数了。而这样的歌：“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革命红旗迎风摆，牛鬼蛇神脚下踩！”就更是直接通向文革歌曲了。

政治歌曲发展到极致，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时代歌曲”。从1972年开始每年由官方推出一本的《战地新歌》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我收存有一本当年我小妹妹用过的中学音乐教材：重庆市中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1969年9月），则是在中学音乐教学方面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代表。

与当时的出版物一样，这本教材的第一页上是作为“最高指示”的“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然后是四首当时最流行的必唱的歌：《东方红》、《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林彪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下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毛主席语录歌曲”，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教育要革命》、《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真正的朋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共13首；

第二部分是“毛主席诗词歌曲”，包括：《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娄山关（忆秦娥）》、《长征（七律）》、《六盘山（清平乐）》、《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七律）》共6首；

第三部分是“革命样板戏选曲”，包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2首；

第四部分是“革命歌曲”，包括：《毛主席万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林彪语录歌）、《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走遍全中国》、《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安源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伟大的长城》、《王杰的枪我们扛》、《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认真搞好斗、批、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红卫兵战歌》、《战士爱唱毛主席语录歌》、《想起往日苦》、《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反帝反修进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共26首。

比较一下我母亲用过的那本三十年代的《初中音乐 唱歌》和这本我小妹妹用过的六十年代末期的中学“革命文艺课”音乐教材，是很有意思的。

三十年代的那本音乐教材在《编辑大意》中说：“本书遵循部颁修正课程标准编辑，供初中音乐科教学唱歌之用”，“本书的歌曲，无论选撰，都注重涵养美的情感及融和、乐群、奋发、进取等等精神的。并力求适合于时代的需要和学生的程度。”“本书的歌曲，都配有适当的伴奏谱，以养成听和声的习惯，增高欣赏音乐的程度——如有特殊的原因，不妨将前几首歌曲，只弹奏旋律，或等歌曲能唱以后，再逐渐用伴奏曲伴奏。”

六十年代的这本“革命文艺课”音乐教材后面也有个编辑说明，其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音乐，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属于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音乐教学应该成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培养学生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掌握好音乐这个武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教学中，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需要选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新歌



曲不断涌现，在授课中应随时选新歌曲进行教学，使音乐课能更好地紧跟形势，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一个是要“注重涵养美的情感及融和、乐群、奋发、进取等等精神”，一个是要培养学生的“三忠于”思想，“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什么时代唱什么歌”，在这里确实有了具体的表现。

【本文原题为《那些逝去的歌声》，发表于《南方周末》时更名为《读三本音乐教材》。现名是本刊另拟的。】■

一个漫画家最后的幽默

它 山

(一)

1976年夏，一个昏沉沉的下午。刚刚写完当晚上演的戏牌子，创作室有人走来跟我讲：在解放碑有个老头喝醉了，在大街上发酒疯。一口京腔，声音洪亮，用语精采，简直是妙语连珠啊。

对调回不久的我这个摘帽右派说这些，可能是对那些言辞有所同情或感染，也有对我提醒与关照的好意。在所谓的“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之后的非常时期，这几天正处于严打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

我意识到那人是高龙生，赶紧收拾瓶瓶罐罐，洗笔倒水后。朝着解放碑“陆稿荐”走去，那是重庆知名的传统烧腊老店。当时只有这家店才有限时定量供应的白酒，他常去那里解决其视酒如命的饥渴。

在交电大楼（即今新世纪）前，只见他跌跌撞撞走来，手里拎着一只土陶小口酒罐。口中念念有词，似若演说的样子。随后跟着稀稀拉拉一群人，老少皆有。有的虔诚如圣徒般紧跟其后聆听传经布道，有的呆若木鸡尾随在后茫然而不知其所云。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苍老遒劲的嗓音，铿锵抑扬的节奏，老头正在用英语诵念着莎士比亚戏剧里的经典名句。当然很多人听不懂，这句话一般译为存在或者消亡，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随情境亦可意译为活下去呢还是不活啦，我的天啊！

刚才有人告诉我的那些“妙语连珠”，可能是老头在用中文朗诵莎翁戏剧里的一些精采片段。比如说玫瑰花即使不叫做玫瑰花，她也依然芳香如故；或者说骗子无须再说谎了，我们都已经是你虔诚的崇拜者，你何必还谎话连篇呢？以及什么疯子牵着瞎子走，这是时代之痛啊；也许还加上了他不少慷慨激昂随口即兴的发挥。曾在农场一次守夜之中，他和我醉倒在窝棚里，他就咕叨过这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话，如果在大街上当时有人听懂了，听明白了，听出弦外之音，听出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真叫做毛骨悚然。我的老哥，把你拖到珊瑚坝马上毙了还有余。我夺过他手上的酒罐，几乎是把他又拖又拽地到了临江门，转上华一路斜通一号桥的公路上，他还在嘟嘟囔囔。这时他认出是我：“老蒋，你调回来啦？好啊。咱哥俩要好好喝一回，一醉方休，cheers！……”——其实我们早已多次见面，互相通报过分别多年后的情况，互道衷肠，互相提醒规劝过千万别乱说乱动。

他杵着我的耳边，悄悄叽咕：“现如今，我倒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右派，是个货真价实的右派！如果当年我不能荣幸地当上右派，那今天我一定会是另外的一个大混蛋。在劫难逃啊，哈哈哈哈哈……”他越说越大声，越说越笑，笑得像个婴儿，也像一头颠预的海狮。招惹着不少路人鄙夷不屑似笑非笑的目光，幸好无人听清楚，也无人认出这竟是两个摘了帽的右派分子。

在众目睽睽下，我俩相扶而行。当然不是疯子牵着瞎子，倒是不谙时艰的傻子领着个借酒浇愁的

疯子，如果莎翁在世看见了，不知他将会说出些什么与时俱进的新鲜名言？

到结核医院转弯处，从七星岗汇集下来的生活废水穿过地下涵洞流到大街对面，进入到一大片房屋之中。破旧的屋檐进退交错，形成下面一条沿着泡子翻天的臭水沟前行的小巷。沿沟行七八米，有



木板向右横跨水沟，引向刚刚下来的公路边坡。坡上踩出的小路通向临江门那头，有的只是一两个脚印，有的仅仅是一块斜面。不知平日老头是怎样回家去的。（左图：原重庆城内一号桥棚户区。画家高龙生“公馆”即在其中。）

远望过去，有一座楠竹捆绑房屋，像个窝棚，但有两层，又像吊脚楼，却不在江边而是建在公路边坡的半壁上。屋顶差不多要跟上面华一路边的石砌护栏看齐。穿过屋后，往前下几个坎，左

手边便是老高的家门口。

他的夫人又恼又怨又无奈，要送他上楼去休息。好在楼不高，楼梯是两根木棒棒，捆扎着几根柴棍。他往上爬，我与他夫人一齐往上推，总算上去了。

楼下是他夫人的住屋兼厨房。楼上是用木条间杂竹杆构成的楼面，约6平米。四周竹篾夹壁，糊上的泥巴剥落殆尽，顶上的盖瓦稀牙漏缝。屋内不仅透光透风，还能上下透气。隔壁是房主，透过夹壁相互可见又能说话。房主以收鸡毛鸭毛为生，当然也要收老高的房租费。

满屋萧然，但挂着他颇具漫画意味的自画像和一幅墨色很浓重的高山流水图，落款为高阳酒徒，未用龙生。里壁堆满旧书报，靠前是他的卧榻，低若榻榻米，旁置一块桌面，有几块砖头垫起，这是他看书写字吃饭的地方。好在床头上方高一米处开着一个猫钻洞，可以欣赏到嘉陵江即将与长江拥抱之前，那种雍容大度波澜不惊舒缓宽阔的江面风光。

老头已经鼾声大作。我回到临江门阁楼上自己2.5平米的穴居，抓紧时间躺一会。睡不着，松弛下来，这时却很有些后怕，没有被无处不在具有阶级斗争火眼金睛的“志愿军”发觉。不久前省美协的《铸剑为犁》版画作者正威，在冷酒馆喝醉了说江青是个什么东西，被抓进监牢，据说就是地段上的婆婆婶婶专政大军的功劳。

（二）

高龙生年长我29岁，1903年出生于山东蓬莱。八岁学画，进教会学校专修英文。毕业后任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画师兼翻译，很受赏识。著有《阿斗画传》漫画集，兼任多家报社美编。少年得志。918后参加抗日宣传队伍，转战于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桂林、成都、重庆等地，与老舍、叶浅予、赵望云等编刊物，出画报。曾以“国破山河在”参加首届全国漫画展，名声大噪，受冯玉祥邀请去武汉办报。后在重庆又受郭沫若之邀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与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研究组工作。

三厅驻地在重庆歌乐山北坡脚下赖家桥。他常以遥想当年的深情描述那里的朝晖夕阴，鸡鸣犬吠的农舍生活。甚为得意的是他家以竹材为主的家具，用蓝底白花的蜡染布做窗帘、门帘、桌布，以及蚊帐等。他更怀念那些朴实憨厚的农民弟兄，在田坎上卷好叶子烟，一支铜头烟杆，轮流一人叭几口的亲昵。那“开窗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岁月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晚年有诗为记：

一派山溪倾绿碧，三间茅屋倚青蓝。

杜鹃彻夜啼难住，田鹭横空飞复还。

爱竹当窗筛月影，喜松扶我听风弦。

……（后两句失记）

赖家桥的风景如画，但在异乡的日子里，总割不断对老家蓬莱的思念：

翠帷数栋添野趣，白云万里动乡情。

蓬莱虽缺芭蕉雨，是处亦无蕉叶声。

也曾深深怀念死于支离飘泊途中的爱妻，而泪洒绢素，感叹吊之：

冶游半世悲神女，幻念余生哀鬼妻。

回首霜天怜骨冷，断肠杜宇替谁啼。

抗战时期，文化界人士云集陪都，在他人生中也是颇为得意风光的时段。茅盾以当时文化界六位知名人士的名字，戏集一副对联。其曰：“老舍老向凤子，胡风胡考龙生。”其中老向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50年代在重庆市文化局戏改会任职，57年划为右派。凤子是著名演员，老舍常夸凤子，“老向”即老是向着、偏向之意。而胡风喜欢高龙生的漫画，常常当众评论其优劣得失。高对胡的意见很重视，胡不满意则重绘，满意者才发表。常受此面试。这是茅盾用胡考（作家兼画家）的名字而言胡乱考问高龙生的文坛趣事。

《新民晚报》从南京迁重庆出刊，其特点是每天必有一幅漫画。读者打开当天报纸抢先看的就是漫画，其作者即是时称怪才的高龙生。只有他在山城独享专栏待遇，名闻遐迩。

特别是他与汪子美合作的《幻想曲漫画展》，在重庆引起轰动。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都到场祝贺，并组织巡展各地，几十万人参观过画展。他画的《忍痛奋斗呢还是当奴隶》，以及《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等漫画，以及汪子美画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前方战士的鲜血滴滴滴落到贪官污吏举起的高脚杯里，近百幅震撼人心的漫画力作，受到广大观众交口称赞。他十分赞赏汪子美的才华，而且是在南京编刊物时，慧眼识珠发现的漫画天才。不过他对自己才智的肯定也当仁不让，溢于言表：

不妨自我一评批，辩证看来高又低。

学似狗熊偷玉米，才如猫鼬盗金鸡。

眼经万卷无存货，兴到一时能切题。

揆我打油油亦好，好油总比劣诗奇。

1940年，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在重庆中山一路中苏文化协会成立，高龙生、张光宇、陆志庠、鲁少飞等参与组成。同时他在《时事新报》任美编，画过许多反映社会生活和市井风情的都市漫画，出版有《陪都风情》、《某某先生传》、《醉生六记》等漫画集。

我曾问他说些什么酒话被打成右派的，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在改造中相互打听是犯忌的，他怕告密者。后来只有我和他一起的时候，又问起：传说你画枝梅花插在夜壶里，是吧？他急切地否认：“简直扯淡！有的人还说我画支鸡毛笋子供在神龛上，是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政策呐，完全是天方夜谭。”

他说是市美协副主席汪子美，脑袋发热，要搞民营画社：“辛社”，要繁荣文化，开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邀约了宋克君、岑学恭、杨鸿坤、谭遥、柳青、邱成九和他七八个人参加。后来无一幸免，全部划成右派分子。汪子美为极右，送峨边劳动教养。

到农场的有岑学恭、杨鸿坤、高龙生。大约在61年底他们先后调回美协去了。在双抢夜战中高龙生有打油一首，可窥一斑：

老夫虚劲颤悠悠，插秧日夜未曾休。

通宵炬火继残夜，但慕眼前归去牛。

15年后我调回，住处离老高较近。我去过多次，每一次去，都是搞到了酒才去。那个孤独的窝棚，

远离凡尘，是个谈天说地的好去处。

我们可以忘乎所以地闲扯，但他已不是当年的老高了。他更醉心于诗和酒，似乎隐然要做 20 世纪的陶渊明。只是没有躬耕于田园的空间，安贫乐素，对如此寥落的晚景，没有唏嘘，只有调侃：

危楼摇摇难稳步，听车楼上似登舟。
幸能熄焰因趋死，未复放狂缘退休。
曾忆当年惊四壁，那堪今日震全楼。
天台只许游空幻，底事人间有白头。

归老蕉窗梦已难，只堪幻笔入诗篇。
瓦楼权作居茅舍，石壁拟如傍竹山。
偶有飞涎疑瀑溅，尽无挂丹仅灯悬。
深宵瓦破游仙梦，夜雨浪浪喜补天。

这就是在华一路坎脚下半壁坡上的捆绑竹楼，他美其名为“听车楼”的居所。把摇摇欲坠的景况与屈居人下的难堪无奈，点化成忍俊不禁的雅趣，不愧是漫画家的幽默。这种笑对人生，调侃自得，渊明乎？龙生耶？

他很喜欢念自己的诗给我听，有的重复念过无数次。他提到在农场的同牢徐芳，大他七八岁。在云贵地区当过县长，中学语文教师，写得一手好字，精诗词。在徐的指点下，他学会调平仄，讲对仗，使其诗作大有提高。他满意而自持地说：“这才是艺术，才叫做进入了境界。这是跟画中国画讲究笔墨一样的道理，没有中国书法笔触的线条终归俗气。”

我说，叶浅予的漫画就有书法笔触。他点头称是，就说起当年：“叶浅予来重庆，到牛角沱省美协看我，头头们见到的是我国的大名家，坐在沙发上的屁股只敢坐半拉。”其挖苦人不惜成本，几近尖刻。

我建议找单位领导帮助改善眼下的居住条件。他沉默良久，转过身来说道：“你可别害我啊，老弟。坐半拉屁股不是谁都能学得会的，今生今世，我就是这把骨头！”

（三）

那一年可说是乌云密布、焦躁不安的日子。自从那天扶老高回去后，团里交出许多事让我做。行政组一位姓肖的，硬说打扫环境卫生也是美工的职责，说美工美工就是美化环境的工人嘛。演出时还要我去拉大幕等等。

当然我行我素，只做份内之事。但是显然在加强对我的监视力度，阁楼上对门对户的金姓女演员，随时到我穴居门前偷听或是打望盯梢。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跟第二次打倒邓小平一致的作为。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愿让高老头跟着倒霉，很长一段时间不到他家里去。直至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我实在忍不住，在一个晚上打着电筒去了他家。

他正在那张无腿无脚的桌面上自斟自酌，桌上还多摆着一只空酒杯，一堆干炒胡豆。他的牙齿很健康，嚼得噼噼叭叭直响，对着麦克风肯定不亚于鞭炮声。老头兴奋地欢迎我：“知道你要来，一定会来，天天等着你来。”其实他已知晓一切，地段上早与各单位同时召开过隆重而沉痛的追悼会，他也是被勒令到场悼念恭祭之人。

老高搞到很多酒，我俩相对默默干了好几杯，初入状态。他说：“毛泽东没死。”我说追悼会开得鬼哭狼嚎的，还没死？他咪口酒，说：“神龛还在，就得供菩萨嘛。”一时难以领悟他这牵动上下五千年历史神经的意涵，或是他又在背诵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名言，反正我没有读过，也想不起那里有这样的话。可能是老头又喝高了，只当是他又一次深邃的幽默。

我担心出来太久，怕有麻烦，提早告辞回去了。

紧接着是打倒“四人帮”，跟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迄至第二年秋回来，我再去看望老头。不见一人，如此寂静。屋旁有一堆焚烧的冥钱纸灰，还有些未燃尽的东西，他写诗的小本子焦头烂额地剩下小半截。我的心在下沉。

房主不知从何处窜出来的，高老头胃癌晚期走了，人去楼空。我棟起未烧尽的残片，沉重而歉疚地从华一路向着临江门的斜坡往上走。耳边响起他的声音：To be or not to be……。

当晚，把纸屑残片一一摊在桌上，找出那些只言片语或剩有的句子，凭我的记忆恢复出了七八首，本文选用的几首就在其中。【2011-5-4 交流文稿】■

我的“阿姨”——怀念彭子冈

杨 教

中年，是连绵的生命序列中一个奇妙的时阶。当我自认为还年轻并渴望从前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的时候，却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身后的小字辈们推到了所谓“前辈”的位置。这实在令我惶恐、难过，但又无可奈何。我就这样以不老不小的身份，出现于老小之间。

几位年轻朋友，都分别向我提过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年轻时是怎么过的？我常常乐于告诉他们：我也有个“阿姨”，就像他们今天有很多关心他们成长的好阿姨一样。

这是整整时隔一代人的故事了。

一位长得很结实的矮个子，坐在四川龙溪河边用水粉写生，画的是狮子滩大瀑布。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回过头来问我：“像吗？”我点点头。他晒得黑红黑红的脸上笑了：“赏脸，赏脸！”

他叫宗其香，是北京来的画家。以后，他在工棚里举行了一次工地写生画展，我认为这张大瀑布是画得最美的。

不久，他就走了。

我给《旅行家》杂志寄去一篇通讯，题目是：《一朵先开的鲜花》。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大意是：我们刚刚收到宗其香画的狮子滩大瀑布水粉画，正愁没有相应的文字，你的稿件就寄来了，真巧。抗战时期，我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在重庆《大公报》做记者，对四川是很有感情的，但那时我的笔只能用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而现在，却由你们这一代人来描写建设四川的壮丽景色了。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高兴，忍不住提笔跟你写了这封信。有几个杂志跟我打听你，你也给他们写点东西吧。

最后署名是：彭子冈。

啊，是她！我从没有见过她，但我身边的一些比我年长的人，跟我讲过她的故事：当黑暗笼罩着中国，她在“陪都”怎样出入曾家岩，怎样巧妙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告诉渴望光明的人们，怎样用她那枝“神笔”，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怎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把毛主席赴渝谈判的喜讯传遍山城……

在她用笔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小学读书的毛孩子，不久就失学了，到一家印刷厂当了排字徒工。社会主义制度让我这个年轻的排字工人当了一名新闻记者。因此，我对为新中国而斗争的革命前辈，怀有真挚的感情，觉得我的幸福成长，与他们为革命流的汗与血是分不开的，其中就包括子冈同志。那时，我觉得这些前辈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的眼睛，是很难看到我身上来的。真想不到，她，子冈同志，居然身在北京，看到了巴山蜀水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我，这是怎样令我兴奋啊！

50年代，处处提倡“师傅带徒弟”式的培养青年的办法，我也希望有一个帮我、教我的“师傅”。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恳切的回信，感谢她——我的前辈——对我的鼓励，并希望她多多帮助我，收

留我这个小徒弟。并且寄去《旅行家》杂志要我填写的作者调查表，在年龄一栏里，我写了一个两位数：21。

信是写了，但我不相信她会再来信。我想：名人有名人的气派，何况她是一位忙人！但愿她不讥笑我的幼稚和奢求就行了。出乎意料，我很快收到了她的回信。读着信，我心里充满了春天的温暖。她并没有允诺我“拜师”的要求，但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比我想得到的还要多、还要好。她说：“我不是什么‘前辈’，以后可别这样称呼我。我看到了你的登记表，你真年轻啊，我可以做你的阿姨了。”

从此，我就称她“阿姨”，给她写的信也多了。有什么高兴的事，告诉她；有什么苦闷，向她诉说；有什么疑难，也向她求教。我的信常常写得很长很乱，啰嗦之极，但她都看了，而且几乎每次都回信。她从不板着脸孔教训我，而是用亲切、平易的语调启发我。甚至，她有什么高兴或烦恼的事，也在信上告诉我，就像我是她的同辈人。一次，她告诉我，她在一次会上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还记得十多年前赴渝谈判时见过她，竟一眼认出了她，用湖南的乡音对她说：“噢，你是子冈！”并询问了她现在的工作情况。她说，他的记忆真好。

就这样，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通了不少信。无形中，这位从未见过面的“阿姨”，成了鼓舞我前进的一种力量。我发誓要使自己成为像她那样为党工作的人，悄悄在自己的钢笔上刻上“用自己的笔为祖国服务”的字样。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一位革命前辈，这样循循善诱、从不强加于人地关心一个未谋一面的青年，我就激动不已。

我想见见这位“阿姨”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了。

一天，我收到她的来信，说她将出国访问，回来路过重庆时准备来看我。我高兴极了，天天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不巧，领导上派我马上到川北调查一个专案，一去就是好多天。等我回到重庆时，她已经回到北京，只在市委看到她留给我的信，说她找我没有找到，只好先走了，希望我有机会到北京，一定去看她。不久，《旅行家》发表了这次来渝的新作：《回到重庆》，又一次把人们带到那艰难的岁月，让人们看到了红岩上的曙光。

我于是下决心考大学，到北京去。我深知像我这样从小失学的人，要考上大学几乎近于幻想，但幻想常会激励人们对美与善的追求。为了能到北京读书，我拼命地向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目标进行了第一次大的冲刺！当我接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时，发现我在两个月的补习中竟掉了九斤肉！

我就这样到了北京。1956年初秋是北京，对我这个惯于南方热天生活的人说，是极其爽朗和清凉的，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开学前的一天，到《旅行家》编辑部去看望我没有见过面的“阿姨”——子冈同志。我走进宽街一个红漆大门，踏过一条洁净的种有花草的小路，穿过树阴下一个圆形洞门，心情反而紧张起来。我想，她一定是位既慈祥又严厉的老太太，或是一位满口政治名词的“首长”……

我猜错了。她穿着一身典雅、素净的连衣裙，站在一间小房门口向我伸过手来。她个子不矮，长得结实而健康，红润的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有一对敏锐的眼睛，虽然她算来比我年长二十余岁，但比我想象中的“阿姨”年轻多了。我握着她的手，嗓子眼里差一点喊出声来：“阿姨！”但我没有喊，因为我已是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而且自命不凡，担心这样喊会有人笑话的，虽然我们身边没有旁的人。

小房间临窗有一张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和摊开的文稿，靠墙是一张躺椅，是她疲倦时休息用的。我一坐下，她就接连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什么时候到北京的？看到天安门没有？对北京的印象怎样？去过北海吗？知道北京有个东安市场吗？……她的声音宏亮，厚实，像女中音那样好听。

“不晓得。”我发窘地摇摇头。

“不晓得！”她笑了，学我的四川口音。

她却谈笑风生。告诉我说，人大新闻系主任叫安岗，能干，年轻，文章写得极好，是个长得不高不矮的胖子。还跟我讲了一个关于他的轶事传闻：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时，因工作太累，深夜盖着被子和衣躺在办公室睡了，一位同志拿着报纸清样让他签字，他惺忪着眼大笔一挥，竟把名字写在被面

上。

她爽朗地笑了，我也笑了，小房里的空气活跃起来。

“榨菜的稿子，写了吗？”她忽然问我。

我难为情地摇摇头。有一次，我在信上告诉她，四川涪陵的榨菜是驰名中外的。每当收获季节，就有一艘艘木船，把绿色的“菜脑壳”从农村运到涪陵加工腌制。这时，乌江和川江汇合的卵石河滩上，就有人搭起很多高高的三角木架，然后把“菜脑壳”洗净，用长绳穿成一串串的搭在木架上晾晒，远远望去，恰如沿江盖起了一排接一排的翠绿的屋顶，映着山光水色，美极了。她说，那你就给我写一篇关于榨菜的稿件吧，我答应了，但为了考大学，一个字也没写。

时间不早，我准备回校。她说，等有了时间，她带我到北京走走，认识一下首都的风貌，还把她在魏家胡同的住址告诉我，让我没事时常到她家走走，说她有个男孩，很淘气……

“别忘了，榨菜！”她又叮咛了一句。

这以后，我们在电话里谈过一两次，不是她忙，就是我有事，在一起玩玩的念头，一直没有实现，榨菜稿一个字也没写。我仍然在报刊上读到她的文章，有一次在一期《文艺学习》上，她在一篇给青年人传授写作知识文章中，竟提到我发表在《旅行家》上的那篇通讯，我既有点得意，又有点脸红，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像她那样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不料这一别就是24年，我们这两代共产党员，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但仍时时怀念这位尊敬的前辈。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有人告诉我，她死了。我难过得流下了泪，时时暗中祝愿她得以安息。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才给安岗同志写了一封信，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向我的老师倾吐了我对她的怀念。不料安岗告诉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音讯：子冈同志还活着，健康地活着！

54

我于是马上给她写了一封信，接着就收到她的回信，她的字，仍然是那样苍劲、古朴，字里行间在兴奋中又流露出一丝苍凉。我知道，我们还需要时间医治心灵上的伤痕，没有见面。直到1980年的4月初，我得知她生病了，才约了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老记者去看望她，一踏进她的家门，就看到她戴着一副眼镜，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袄，正坐在窗下一位青年编辑研究第二期《旅行家》的稿件。青年编辑走了，她才慢慢站起来，左手扶膝，右手习惯地向前伸出，扶着身边可以扶到的东西，艰难地向前挪着步子。我走前去扶着她，在这一刹那间，我又想起了24年前的老话题：天安门，北海，东安市场，榨菜……我嗓子眼里又差一点喊出来：“阿姨！”但我胸口好像堵着什么没有喊出来，因为我已到了四十多岁的中年，已经是一个做年轻人“师傅”的人了。

岁月与磨难，在她额上留下了痕迹。所幸的是，她并不消沉，仍然有一颗热爱党的事业的赤诚的心，所以一谈起来她的《旅行家》来，话题又多了，表情又活泼起来，使人想到，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确实是当年那个精明强干的彭子冈，虽然年高体弱，但雄心犹在，秉性如初。

这次会见后不久，我又接到她的来信，说她准备让年轻人接班。接着又有人告诉我，她住院了，叫我去看望她。但我的穷事极多，一直未能如愿。12月，我从湖南开会回来，与一位老同学见面时，又一起谈到了子冈同志，谈到她最近发表的在医院写的文章《人之初》。这篇文章的潜台词，大约就是“性本善”的意思吧，但我一想到“人之初”这三字，就想到了连绵不断的生命序列，想到了我身边那些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朋友，想到了他们那带有几分稚气的、充满强烈求知欲望的笑脸，想到了子冈同志昔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好像陡然增加了很多勇气……

【交流文稿，写于东湖畔】■